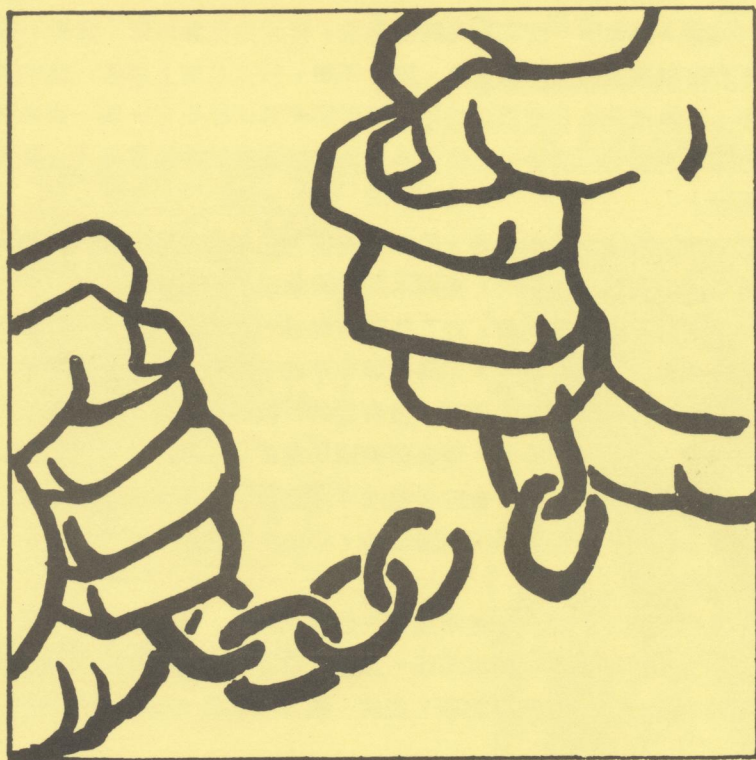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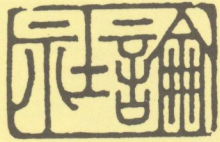


民主台湾

31



1983年9月1日



台灣人民要

今年六月間，「龍的傳人」民歌作曲者侯德建跑到大陸，引起台灣社會震撼。在討論事件的前前後後之外，人們也探討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並在黨外陣營內，導出一場「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戰，迄今戰火猶未平息。

七月底，中共副主席鄧小平提出對台政策六點方案，引起關心台灣人士議論紛紛。鄧小平是當今中共最具實權人物。在葉劍英退休，廖承志去世後，他親自出來宣佈對台政策，顯示中共對於統一問題的決心。和葉劍英的「九條」聲明，廖承志的歷次談話相比，鄧小平的「六點」更具體，更乾脆。他甚至允許國民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不變，允許向美國購買武器，允許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不變，只要名稱上承認一個中國即可。這種無可再退的讓步，將使國民黨政權很難拒絕，因而將使國民黨失去一些一貫支持者的同情，而倒向中共。但這種分贓式的讓步也將使許多正與國民黨爭民主的黨外人士及受壓迫者失望、反感、甚至對立。

這兩個事件，說明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關係，已到了愈來愈令人關注，甚至在台灣內公開討論的地步。中共態度的堅決，更顯示問題的急迫，形勢不饒人。我們呼籲所有來自台灣，關心台灣的朋友正視這個問題，並且共同來討論。我們願拋磚引玉，提出幾點意見。

首先，我們對中共對台政策，尤其是鄧小平的「六點」，是十分不敢苟同的。「六點」中完全沒提到台灣人民的要求與奮鬥，沒有提到台灣的民主運動。這種狀況下的「統一」，不僅無助於台灣人民的正義事業，而且將使國民黨當局較無顧忌地反對改革，鎮壓民主運動。如衆所知，近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的各種改革運動是在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的條件下完成的。如果沒有這些困境，國民黨將很難讓步的。鄧小平如此優待國民黨，很顯然是不利於台灣人民的改革事業。

因此，我們看到，「統一」並不能解決台灣問題的。即使「統一」了，台灣的民主問題，勞工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經濟問題，乃至於教育、文化、社會等種種問題仍然在那裡，而且不可能因「統一」而有什麼突破。即使「統一」之後，民主運動還是要繼續推動，繼續支援。

這裡印證了一下我們長期來的根本看法：民主是目的。社會的改造，人民的當家作主，要比「統一」重要。這個同樣也適用於「獨立」；有人由於反對中共的制度或對台政策，因而主張獨立，似乎認為「獨立」便可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但我們並不那麼樂觀。世界上多的是自己壓迫自己人的政權，因此，「獨立」也不能保障人民的幸福，保障社會制度的合理與正義。人民的覺醒，社會制度的改造，才是問題的核心。

了解中國

本社

其次，我們主張台灣人民應力求與中共對話接觸。由於國民黨的控制與反共宣傳，台灣人民一向很少與中共或中國大陸接觸，這是不利於台灣人民的改革事業。不管你贊不贊成這個制度，中共却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龐然大物。忽視它，只有方便國民黨壟斷海峽兩岸關係的特權。這正是國民黨長期禁止人民接觸，所希望達到的效果。這種壟斷，除了可以防範台灣人民插手參與決定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外，平時還可以用來恐嚇人民，用來維持戒嚴，逮捕政治犯的藉口。三十多年來，台灣正是這麼過來的。

總之，在決定台灣前途之前，台灣人民應當親自接觸中共，了解中國大陸的實情。我們應當有勇氣拋開國民黨加諸於我們頭上的陰影。追求「知」的權利，是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是正確決定我們前途的必要前提。

第三，我們認為決定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是一種歷史性的決定。它不僅影響我們這一代人的幸福，也將影響子孫萬代的命運。歷史性的決定要有歷史性的眼光，也要有歷史性的知識。在台灣，我們的歷史教育十分不足，而且偏差。因此，我們對台灣的現況，很不易了解它是如何演變到今天這個狀況。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便很容易執着於現況的維護，而很少探討現況的合理性，持久性，以及是否是最好的選擇。影響所及，很容易把現況當永恒，把美國當作世界中心。我們很少討論台灣長遠的問題，也不易從更廣的世界來了解台灣，以及不易去關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受壓迫的情況。缺乏這些，就容易把台灣問題從時、空的流體中孤立出來。

最後，我們呼籲建立一種平等，自信與謙虛的態度來探討與海峽兩岸的關係，來接觸中共，接觸中國大陸人民。有些人總覺得台灣比中國大陸小得太多，一接觸，就會被吃掉，或是被統戰掉。又有些人，認為中國大陸貧窮、落後、無知，因而抱着一種瞧不起，或者怕吃虧的心態來看待問題，接觸對方。這兩種態度，都有礙於客觀地認識，正確的判斷。但在長期的隔絕與國民黨恐共教育下，這兩種態度傾向往往很難免，希望我們自覺地克服。

台灣與大陸只有一水之隔。兩地人民不僅有相似的語言、習俗、文化、有爭取民主，反抗帝國主義的相似歷史命運；展望將來，也必然會有密切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來往。然而，雙方人民的正常來往與相互了解，却被人為地切斷了。這種切斷，方便了國民黨在台灣統治，也方便了中共分贓式的對台政策。這是不符合兩岸人民——尤其是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改變現狀，台灣人民要積極地接觸中國，了解中國。一個更民主、更進步、更富生命力的台灣社會，必將在更廣闊的接觸與了解中得到助益。

專論

- 1 台灣人民要了解中國 本社
我們批評中共對台政策，但主張台灣人民盡量接觸中國

瞭解台灣

- 30 台灣的官僚壟斷資本 柳白
摘要了作者對台灣一個重大經濟層面的深刻研究
- 5 凍土中的春芽 台大人
這份珍貴的島內來稿中，詳細描述去年十月台大學生爭取學生權的一段珍聞。
- 15 台大學生權風云 近聞與短評
學生權的爭取，一部份同學被約談了。文後附有一份島內傳來被約談學生的答覆文
- 16 山地青年的覺醒 近聞與短評
一向最受壓迫，最被忽視的山地同胞，開始站出來說話了。

探討中國

- 31 中國對台政策及台灣人民的反應 李哲夫
中國對台政策正在形成，而台灣人民的反應還在混亂中。文後有討論

認識世界

- 49 韓國人權運動及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卜令
——記一次金大中的演講
- 43 帝國之腦(三) 范棟譯介
介紹美國太上國務院——外交關係理事會，看他們如何操縱大戰中美國的外交

思想

- 35 黨外只需操心人權嗎？ 林中平
評鄧維楨與李敖的人權觀，並介紹了英國十九世紀自由黨及近年波蘭團結工會的奮鬥史

歷史

- 19 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 戴國輝
從這位研究台灣史的泰斗故事般的自述，你不僅學到許多台灣史的秘聞，還體會到一種台灣人治台灣史的史識

書訊

- 48 美國中學裡，越戰史的教學 葛屋節譯
看看美國統治者意識型態的「再生產」

藝文

- 52 電影「大理石人」「鐵人」
介紹華達名片，並介紹波蘭的工人奮鬥史

4 編輯報告

49 這是您的刊物(稿約)

57 訂閱是最好的支持

編輯報告

近兩三個月來，最引人注目的消息，在台灣是侯德健跑去大陸學作曲，在海外則是鄧小平的六點對台主張。這兩者均涉及台海兩岸關係的問題。我們刊出了一篇社論，以及一個座談會的紀錄，都是圍繞這個主題討論的。這是一個關係重大，而又錯綜複雜的大問題。我們知道各方意見分歧，但是可以溝通、分析的餘地很大。我們期望您的來稿、來信討論。

把時間往前挪回兩個月，那時台灣最側目的消息應是王昇的調職。王昇調職意味著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尖銳化，而且還將圍繞著蔣經國去世前後而升級或突變。如果再把時間拉前半年一載，那麼台灣當時最擾人憂慮的應是經濟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勞資糾紛問題，社會暴力問題、等等。另外，不能忘記的，台灣民主運動這幾年來一直不斷地在謀求成長、突破，以及和國民黨發生種種的鬥爭。

往後看台灣的發展呢？繼承與權力鬥爭、經濟、台灣人民的反抗以及中共的統一壓力將繼續困擾著台灣局勢，影響台灣的前途與人民福祉的大問題。

這幾個問題都很重大，但要根本地得到合理解決的關鍵，應當是台灣人民的覺醒與反抗運動。這裏，我們看到民主運動將被賦予一個較前更廣大的意義。台灣民主運動的任務已不只限於爭取選舉的勝利，批判或制衡國民黨等等政治層次而已。它應當負起領導台灣人民的任務，克服這幾個重大問題所能發生不利於台灣人民短期與長期利益的傾向，讓台灣人民在這可能是歷史性轉變的時候真正站立起來！

黨外人士目前的準備似乎還不足以負起這個歷史使命。但我們也注意到目前黨外內部的檢討工作

也在加深中。這或許是目前黨外難有突破下的自省，但客觀上將起著推動黨外更成熟的作用。

了解了目前檢討黨外工作的重要性，則本期林中平先生的「黨外只需操心人權嗎？」是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

民主運動，這個推動台灣社會前進的力量，可以在大學校園中看到它的影響力了。本期有一篇非常難能可貴的島內來稿：「凍土中的春芽」，對於去年十月間台大學生爭取學生權事件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歷史是一堂課」、「歷史上的罪惡可以饒恕，但却不可以忘記」，這是戴國輝先生去年在日本批評日本政府刪改歷史時所發的義正詞嚴之聲。戴先生是當今台灣史研究的泰斗。他將一生研究台灣史的經驗煥煥道來，令人從故事中獲取知識，毫不覺得「歷史」的枯燥。

波蘭的問題太值得關心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的參考了，許多文章自然會談起它，許多作者也自動會來探討它。上述林中平評黨外人權觀談到它，另一篇電影介紹更是集中於波蘭工人的奮鬥史。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其他文章如「美國中學越戰史的教學」讓我們了解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如何「再生產」出來，「帝國之腦（三）」拿實例來說明美國這個太上國務院如何塑造戰後的世界局勢，等等都是引人深思的文章。

上期出刊後，我們得到一個最多的反應是：太枯燥、太嚴肅。這與我們力求與讀者密切聯繫的初衷是不利的。本期編完一看，還是長篇連連。這是編者才能所限。但仍努力嘗試尋找些簡短輕鬆的文章，希望讀者能來些這類稿件，幫幫編者這個煩惱的問題。

台大人

凍土中的春芽

台大學生爭取學生權

停刊半年後，大學論壇復刊號（即44期）與宣言



5 民主台灣 31期 1983年9月

大學論壇社

復社宣言

半年前由於「過多的熱情」，我們被學校指責「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惡意攻訐有損學校聲譽」。本社在一張紙令之下停止活動，並有兩名社員遭到比大過處分！

今天，我們懷著「更多的熱情」宣佈復社，迫不及待地準備擁抱離別半年的校園和同學。

。熱情當可以消弭許多不必要的誤解和不快；雖然我們依然感覺表達意見管道並不公平、所受的處分未必合理。但對於已過去的我們不會再用抗議和抱怨來表示。希望我們的熱情能夠換來更多的體諒和了解！

當然，論壇社本身的步伐調整也是必要的，我們打算擴大社員數量並確立原有的民主精神，來達到「集思廣義，降低火氣的目的，並打算參與更多校園內外的服務工作，並維持原有的實踐精神，來證明我們除了搞宣傳，還能進廟堂。」

學校是我們的鄉土，須要大家來愛，在規的許可之下，我們願意永遠走在台大社會參與的尖端。

想做點事的朋友，我們歡迎你來。

知識份子為社會的良心。大學是知識份子匯集處，是培養社會棟樑的地方。大學生不僅要具備高深的學識，還要熱情地擁抱社會，作為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因此，大學生應該關心社會，投入社會。他的理想擁抱，才不會落空。

然而，在台灣的大學生，却和社會嚴重的脫節。他們既不能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也很少對社會現狀提出洞見與批判。他們甚至連對社會的了解都缺乏，往往掛在社會前進列車的末節車廂。他們大部份連讀書都不得其法，長於記誦而不易消化，更談不上創見。

所有這些現象，當然是台灣教育制度的產品。這樣的制度已愈來愈不合社會的需要。在時代脈衝沖擊下，許多大學生開始懷疑這種靜態的，象牙塔式的大學教育。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當時台灣內外局勢激盪，大學生開始關心社會、關心國事。從保釣事件開始，到「向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許多大學生熱心洋溢地投入反省、批判及服務的洪流中。那段時期可說是三十多年來，台灣的大學生最富活力的了。

然而，好景不常。這種充滿朝氣活力的時期並未延續下來。校園復歸平靜，批判力與改革的熱忱再度消失。一直到最近，台大代聯會破天荒地造出了一位非國民黨籍的主席，才又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期間大約有七、八年相當平靜的時光。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但却不是這裡要談的焦點。

吳叡人能夠在國民黨嚴密的控制中，脫穎而出，成了第一位非國民黨籍的代聯會主席，這決不是偶然的。早在半年多前，台大四個大學生社團——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台大法言社及台大醫訊社等主要領導人，即已積極提倡學生主權意識的重建，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他們熱情的提倡，却遭到校方冰冷的壓制，提倡最力的大學論壇社竟被停刊半年，幾位最熱心的同學且被記過處分。

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未白費。學生的心開始活起來，熱起來。他們開始關心自己的主權，開始討論，開始注意代聯會的選舉。於是一反過去數年那種一人獨選的局面，今年台大代聯會及各院院代會的改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競選。吳叡人的當選，便是在這個普選覺醒與關懷氣氛下發生的。歸根就底，得歸功於去年年底四個社團的耕耘。

這段外人少知的耕耘過程，終於有機會介紹到海外來了。我們要多謝「台大人」先生。他用心地搜集有關資料，整理成章，携帶來海外，我們才有機會一睹這段奮鬥的詳情。

原文中還有多個附件。限於篇幅，無法全刊。標題與小標題均係編者代擬，以助閱讀。特此說明。

——編者識

台大學生爭取學生權

由於國民黨丟掉大陸的慘痛經驗，來到台灣之後，加強社會控制的力量，也加強了大學校園的控制。首先將軍人駐進學校：一面做保安的工作，一面做軍訓的工作；隨後國民黨也在校園內成立黨部，除了要吸收學生黨員外，最大的目的是要維持校園安定；情治單位的網也密佈在校園裏，所以，三十幾年來，大學校園在國民黨嚴密的控制下，幾乎安靜的有點反常，其中雖有保釣運動，但並非是學生自發性的運動，而是在官方策劃下，支持下的形成，因此持續性也不高，之後，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在官方的策動下，也有學生集體抗議的事。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可以稱為學生運動的。

學生在這種校園環境下，變得冷漠而現實。尤其近幾年來，學生的參與感普遍很低，社團日益衰微，以台大大學論壇社為例，在保釣運動前後，是全校最活躍的社團之一，但在一九八〇年時，社員竟只有寥寥幾個，而也未曾辦過什麼活動，使得一些比較熱心及關心周遭環境的人有志難伸。

學生主權意識的重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有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一九八一年有地方選舉，遂使得學生投入選舉的活動，漸漸有了社會的參與感。台大校園裡也漸漸凝聚了這一批關心社會現象的學生，後來這批學生經過多次的自我反省，認為應該提高學生的參與感，

今天大學生參與感的低落，對社會的冷漠，最主要原因是學校控制學生生活太嚴，而學生也太過馴服。

一九八二年九月底台大大學論壇社、大學新聞社、法言社、醫訊社等四個社團希望借由熱絡地談校園民主一主張代聯會主席普選，來引起學生的注意，並進而欲提高他們的參與感，其詳細情況如下：

大學論壇社曾經和大學新聞社、大陸問題研究社，醫訊社個別討論如何提高學生的參與感及對社會的關心，大學論壇社認為今天大學生參與感的低落，對社會的冷漠最主要原因是學校控制學生生活太嚴，而學生也太過馴服，因此要提高學生的參與感及對社會的關心，首先必須重建「學生主權意識」。前任社長劉一德於是在新生代雜誌第二期探討台大校園專題中，以筆名寫了「學生主權意識的沒落與重建」，希望喚起台大學生的共鳴，此篇文章出現後，除引起校方一陣緊張外，還驚動教育部某處長召見他。這是台大校園聯合爭取主權的濫觴。

四社團共商代聯會普選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學論壇社召開社內座談會，討論的主題有二：1. 論壇社精神及其實踐；2. 如何促使「班代表聯合會主席」改為學生直接選舉。第1項是要做為第2項行動的原動力。此次會議除論壇社社員外，並選大學新聞社社長、醫訊社社長、法言社社長一同出席討論，由於這四個社團在校內對時局的共識及意識形態較為接近，並且社員亦重複甚多，如現在大學論壇社長亦兼任大學新聞社總編輯，法言社社長去年也是大學新聞社活躍份子之一。因此，討論會無多大的歧見，進行很順利，最後決議：大學新聞社、醫訊社、法言社是出版報紙的社團，希望在最近這一期刊報上能針對代聯會問題加以討論。另由四個社團各名召開班代表座談會，希望藉由座談會與班代表溝通意見，並取得班代表的支持，通知單由大學新聞社草擬寄發，座談會由大學論壇社主持。決議後，各社團便分頭進行工作。

校方怕影響此次代聯會主席改選，乃由覺民學會（這是一個和學校國民黨部關係密切，思想非常忠貞，並且行動秘密的組織。可以說是黨員精英所組成的社團，平常負責監視台大學生的動向，代聯

◎◎◎為普選的學生權力機構催生◎◎◎

台大一萬三千名同學們：當領悟「台大人」三個字將與我們終身存在時，我們不知道該感到光榮，還是感到羞愧！

是的，我們引自己的學歷、前途為榮，引優良的師資、校園環境為榮！甚至引自己對跳舞、橋牌、電影的深入了解為榮！然而，你是否想過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

言論出版得受審稿制度過嚴，集會結社得受審核、督導，連腳踏車怎麼擺，海報怎麼貼，我們都不能做主！單是這些身邊所發生、校園內所共有的問題，我們就已經毫無置喙的餘地；你相信畢業後您會「一舉」成爲一個有爲有守的棟樑麼？你真的相信？

大家都不希望漫無章法，但我們要求一切紀律以學生自己做主爲基本條件，我們渴望自治！代聯會呢？我們「學生權力」的代表那裡去了？天曉得本月中在班代表們關起門來的投票裡，我們極可能又將選出一個「衆望所歸」的傀儡。由於未經普選，學生無法參與，代表性也就搖搖欲墜。學生無力，這是蓋棺之。

同學們！我們不想再廢話連篇，只提出一項簡單的要求：這次假如沒有全力主張普選的候選人，請大家催促您的班代，投給廢票一張。廢票是促使普選誕生、校園進步的最省力辦法。

我們要普選，不要寡頭和傀儡！孫中山的全民政治萬歲！（財力單薄，有同感者請影印傳閱）

熱愛台大的學生 敬上

會及院代會主席改選時，並做輔選的工作。)出面邀請四個社團社長溝通意見。

「班代表座談會」流產

十月五日，大學新聞社倉促印了召開班代表座談會通知單，並寄出部份通知單給班代表。次日，學校行政單位立即知曉此事，甚爲憤怒，由課外活動組萬分火急尋找四位社長，大學新聞社長恰巧到校總區辦事，很快被學校找到，大學論壇社長被電話聯絡到，課外活動組要他去一趟，他看課外活動組如此急，必定很重視這件事，因此想先與其他三位社長商量後才去。而醫訊社、法言社長分別由醫、法學院訓導分處找去談話。此事因此就由大學新聞社長和課外活動組主任協商，答應學校四個社團停止「班代表座談會」活動，而學校則不追究此次責任。

這次「班代表座談會」被制止後，校方認爲有必要開導這四個社團，因此商請校長十月八日召見四個社團的社長，另外出席的還有覺民會會長及代聯會訊代表，和藹可親的虞校長循循善誘四個社長，希望他們能以持平、客觀、謹慎的態度來報導事實。虞校長的口才真好，一聊起來就是天南地北，一會說在暑假的見聞，一會說在國外的見聞，四個社長楞楞地不曉得如何插進話。四個社長原以爲晉見校長，必定能與校長溝通意見，接受或考慮他們提出的觀點，這下難免大失所望。四位社長與校長一席話後，失望地蹣跚步出校長室。

「告台大同學書」風波

四位社長離開校長室之後，步回招收新社員的攤位（當天是新生訓練，每個社團均可申請攤位招收新社員），發現到處有人發傳單，赫然一看，題目竟是「告台大同學書——為普選的學生權力機構催生」，署名熱愛台大的學生，內容是對學校一些制度表示不滿，批評代聯會的現狀，並呼籲台大同學催促班代表投給沒有全力主張普選的代聯會主席候選人一張廢票。校方在短短的時間獲知此事，出動人員搜查傳單及散發傳單的人，但由於散發傳單的人員行動敏捷，在短短的時間內，全校各個角落

這份「告台大同學書——為普選的權力機構催生」出現在1982年10月8日台大新生訓練場所，同時亦出現在台大校本部及法、醫學院各角落。

包括法、醫學院、學生宿舍、教職宿舍均有了傳單，如此快捷的行動，真嚇壞了校方訓導工作人員，並立刻聯想到會幹此差事的必定是這四個主張代聯會普選的社團。下午，課外活動組負責安全調查的人員，把大學新聞社長找去，盤問是否他們幹的？背後是否有與外面的人掛勾？因據他們的研判這張傳單與大學新聞社那篇被退回的社論某些觀點相同，但「告台大同學書」一文中開頭的稱呼——「台大一萬三千名同學們」，似乎應是外面人稱呼台大同學的口吻，可能是外面某撮陰謀份子故意在十月份裡製造社會不安的現象，甚至與當天報上刊載的

高雄大統百貨公司爆炸案牽扯在一塊，聯想力真是夠豐富的。因此，告訴他這次學校必定要徹查，並且外面的情治單位已經注意到這件事情，如果是你們幹的，最好不要再有行動，否則到時候後果自負。大學新聞社長丈二金剛——摸不到頭緒，滿頭霧水，想這又不是我們幹的，為何找我來？

光輝的十月，不要輕舉妄動

十月九日，早上課外活動組主任又找大學新聞社長去再三囑咐，叮嚀再三，說學校一向都很愛護學生，希望你們能自愛，要不然到時候出什麼差錯學校可不管了，在這普天同慶、光輝燦爛的十月裡，不要輕舉妄動，否則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並希三思。

十月九日，是星期六，下午本是休假的時間，由於昨天校園出現那一份傳單，校方訓導單位不得不召開緊急會議，以商量對策，會議中除做出徹查傳單來源的議案之外，最重要的是務必使得這次代聯會主席順利產生，否則學校將很難下台，讓那些主張普選的人更有充份的理由要求普選，因此決定由各院訓導分處發函通知班代表務必出席研習會選出代聯會主席，並批評主張普選者在製造校園不安定。並且動員系主任，由他們直接要求各系班代表一定不可投廢票、代聯會主席唯一出馬競選的候選人，在十月十二日早上散發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選戰快報」。

我們不需鄉愿的代聯會主席

十月十三日，據聞校總區海報欄上，曾出現一份海報，內容是「抗議調查局干涉校園事務」，貼海報者被校警追捕失蹤，謠言滿天飛，傳到最後，大學論壇社竟被認為最可疑的份子。大學論壇社員得知此事之後，召開緊急會議，研判此次消息可能是被人故意栽贓，認為有必要公開澄清，並且對代聯會主席候選人對代聯會主席改為普選態度模稜兩可，提出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視聽的意見很不欣賞，認為亦有必要加以批判。乃仿效代聯會主席候選人印製傳單，題目是「我們不需一位鄉愿的代聯會主席候選人」，對候選人提出四項普選的懷疑：1

如果普選只有二成不到的投票率怎麼辦？2 普選未必能提高活動參與。3 普選後班代表的職位怎麼辦？4 是否會貶損各院代會的代表性？加以嚴厲的批判，內容精彩，字句鏗鏘有力，是一份相當成功的反擊傳單。這份傳單經費是在你出伍拾元，我出壹佰元，四處募捐得來的。這種募捐的方式除了能減輕社團經濟的拮据，最重要的是能提高非社員的參與感。十月十四日早上十點，論壇社的社員在全校各個角落散發傳單、並在代聯會主席候選人放置「選戰快報」的地方，亦如法泡製放了傳單，讓同學有比較的機會。

可是這份傳單出現後，它的命運卻沒有候選人傳單那麼好，傳單放置在公共場所的，校方立即派人拿回課外活動組處理，散發在宿舍的由教官逐室加以追回，在短短的時間內，此份傳單即已消聲匿跡，台大同學見到者並不很多。傳單上是署名大學論壇社，因此校方四處尋找社長，此時他正在社團辦公室，課外活動組人員打電話找到他，說下午能夠過來一趟課外活動組，約莫過了二十分鐘，又有一個打電話說訓導長要找他，並且要他把印製傳單的地點、份數做一份報告給課外活動組，大學論壇社長以下午必須上課，沒有時間見訓導長為由而沒去，報告則推說見到訓導長之後再寫。大學論壇社的傳單出現後，由於震撼力極強，校方怕影響到代聯會主席能否選出，因此發動黨部刊物「知忠通訊」圍剿，社論指出主張普選者並不够冷靜思考問題，文章表面是在探討代聯會主席普選問題，骨子裡却是在反對普選，文中集保守勢力說法之大全，另該刊物亦藉機為候選人宣傳一番，真是用心良苦。

索仁尼辛——從歡迎到失望

在與大學論壇出現的同一天，醫訊社貼出海報歡迎索忍尼辛訪台，海報的內容有：「歡迎索忍尼辛——人權的鬥士、十字架的文學家、悲愴的靈魂」、「歡迎索忍尼辛，你使血腥的手顫抖」、「歡迎索忍尼辛，你叫光明的人安慰，黑暗的人喪膽」。足見醫訊社社員對索忍尼辛的精神十分崇敬。但在數日之後，對索忍尼辛公開演講的內容相當失望，醫訊社社員說索忍尼辛對台灣的了解不夠，盼他能多待在台灣，真正的了解台灣才發表演說。

主旨：公告本校學生社團「大學論壇社」因違反「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規則」，予以停止活動六個月。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規則第十五條第3、4款及第十六條之規定；

第十五條：學生社團負責人、工作人員或其成員所為之活動或發表之文件或刊物有左列行為之一者，依校章提付懲戒之：
1. 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2. 惡意攻訐有損學校聲譽者。

第十六條：學生社團其有前條情形之一者，學校得斟酌情節令該社團停止活動、改組或解散。

說明：七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本校活動中心、總圖書館、文學院、工學院、法學院等處，發現以「大學論壇社」名義散發之傳單。經查為本校學生社團「大學論壇社」所散發，並經該社社長承認原稿為該社幹部所共擬在案。

二該傳單之內容與十月八日未具名之傳單，相互呼應，縱間向學情感，嚴重影響本校安寧秩序。且按其內容，顯係破壞本校代聯會選舉，並以本校向有「文字禁」為詞，破壞本校形象，有損學校聲譽。

三復查該社前任社長於十月十六日班代表研習會場，委託非班代表同學，攜帶傳單入場散發，經當場查獲實破壞本校所舉辦之活動，嚴重妨礙秩序。

四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停止該社一切活動之權利。

通告大學論壇社社員：

校長

唐北中

這是一件令人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的事實；本社基於對校園民主化的執著信念，力主代聯會主席改為普選，乃針對十月十二日代聯會主席唯一候選人的「選戰快報」中，若干論點提出批判，竟被學校認為破壞代聯會選舉，遭受停止社團活動的嚴厲處分，學校非但視於學生的要求，更做出違反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權的決定，我們相信論壇社的活動可以被停止，但是論壇社的精神不會被消滅；今天學校說論壇的過，歷史亦將說學校的過。本社會據理力爭，向學校訴願請求更改處分，唯在未獲得學校允許之前，盼各位社員遵守學校規章。

大學論壇社社長

賴勁麟 啟

這是台大停止「大學論壇」社六個月活動權利的公告。論壇社長賴勁麟轉發給社員，並附一個通告信於後。

緊張刺激的改選會

十月十四日，下午是班代表研習會，改選代聯會主席十二點半一到，整個活動中心都是人潮，再清楚一看穿軍人服裝及青年裝的穿梭其間，人數衆多，一瞬間全部進入改選會場，分坐前排，中間及後座，平均二~三位班代表就有一位教官或職員在監視，彷彿班代表們要造反似的，改選會場外，覺民學會份子滿佈，而海報街不時派人來回巡邏，整個改選過程就是在這種氣氛下進行着。在如此嚴密的控制下，會場竟然又出現一份俱名「一群熱愛台大的同學」給班代表的傳單，頗具煽動力，全文如下。

各位親愛的班代表：

現在，在你的手中，正握着一張可以大有作為的選票！

學校保守勢力是否透徹檢討制度缺失，台大學生是否有可能擺脫數十年來被當做花瓶、當稚童、馴畜的命運；現在就將在你的手中揭曉！

請問，多少年來，我們的學長前輩一年又一年呼籲代聯會主席普選了，那一次我們得到的答覆不是千篇一律的「研究辦理」、「從長計較」、然而辦理至今，計議至今，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校園不宜有政治活動」！是獨額競選！

前人妥協上當，是我們最好的教訓！切記勿再讓你那張選票成為延緩進步的「御用選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校園想要民主，學生要先顯示力

量。廢票，是顯現力量的唯一選擇！

廢票！廢票才能迫使學校不得不做，劃出改採普選制度的時間表！只有「不得不做」才是可靠的，勿再相信他們的誠意道德。

期待你這張神聖的廢票！

請注意，該同情的，不是台上那個人，是台下的我們，以及無法走近票箱的一萬三千名兄弟姐妹！

一群熱愛台大的同學 敬上

傳單剛散發即為教官發現，教官從一位哲學系的班代背包中搜查出傳單來。

八十一位學生（編按：文章中說只有二十多名與實際簽名人數不符）簽名向校長請願書。

「今天學校記論壇的過，歷史亦將記學校的過」

十月二十二日校方公告大學論壇社停刊六個月；醫訊社被醫學院訓導分處要求撤換社長及總編輯。另外校方在議處大學論壇前社長和現任社長時，曾發生二十多名學生集體向校長請願，要求學校取消將論壇社停止半年之決定，對有關同學之懲罰由最寬大處着眼，並要求不要阻撓要求普選之意見出現於校內刊物。最後在二個月後，前社長被記一大過，現任社長被記一大過一小過。

解散醫訊社事件

之氣魄式微久矣。民者國之本也；民氣如此，國將奈何？

吾校乃全國精華所在，理當激發民氣之旌鼓。雖不必因此輕法失紀；然

而較難敢言之士，包養特立之人，實應儘其可能而為！

今觀承辦人之草率決定，誠感失望！

校長或因吁宵勞煩，無暇顧此。藉求以吹彈之力，為我等向校內承辦單

位告陳；言者有二：

一盼學校取消將論壇社停止半年之決定。其有關同學之懲處，希由最寬

大處着眼。

二學校應力促現代聯會，迅速而公正完成「應否普選」之意見調查。並

不再阻撓要求普選之意見出現於校內刊物。

再拜 尚木 楚 璋 傑 劉 燕 徐 美 智 施 能

楊 昭 忠 鄧 明 珊 學生 譚 成 勇 陳 建 國

葉 宗 鑫 洪 裕 恆 李 崇 厚 蔡 劍 峰 明 呂 景 傑 周

謝 麗 娟 楊 梓 正 王 經 洛 楊 士 節 李 長 政

陳 慶 鳴 楊 耿 恆 杜 勝 榮 陳 信 璋 王 獻 綱

孫 心 怡 楊 文 湖 何 敏 文 胡 文 棟 蔡 學 仁

王 玉 璽 高 乾 記 文 勝 高 永 冠 林 宗

陳 克 龍 楊 意 聰 黃 聰 勳 卓 明 福 林 煥

馬 騰 雲 黃 君 鳴 唐 玉 麟 黃 鴻 森 孫 文

陸 訓 賢 陳 宏 成 范 光 怡 蔡 明 時 梁 立 天 簡 文 卿

王 國 英 翁 漢 敏 傅 文 民 陳 立 齊 蘇 瑞 雲 陳 順 良 邱 瑞 堂

李 毅 勇 張 永 毅 楊 令 嚴 周 進 忠 游 建 濤 黃 志

王 國 英 翁 漢 敏 傅 文 民 陳 立 齊 蘇 瑞 雲 陳 順 良 邱 瑞 堂

李 毅 勇 張 永 毅 楊 令 嚴 周 進 忠 游 建 濤 黃 志

台大校方在歷經普選事件之後，想要重新整頓社團，首先下手的是涉及普選事件的醫訊社。醫訊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報紙，已經由醫訊社持續出到十三年，醫訊社一直是一個開放給醫學院的同學自由參加的，獨立操作的社團。由於創社時期受到學校無理的限制，乃歸劃於醫代會。醫學院的書畫圖書館和社會服務團，亦在未獲准登記為獨立社團之情況下被推進入醫代會。這幾個社團長期以來就獨立地運作。「醫訊社」一直在民主合法的手續下，自選社長，獨立出版。今年，醫代會主席曹永昌，為了「學校求好心切」，「達到學校的期望」（見曹永昌文），宣佈解散醫訊社。所謂「醫訊問題」就是「解散醫訊社」這件事。

醫訊社是醫學院內一個人文性的、思想性的、新聞及輿論性的社團。多年來從社會上各界，包括

衛生界、文學界、教育界、思想界及文化界吸收營養來滋潤醫學院內被自然科學禁錮，被自然科學疏離的心靈。因此醫訊社除了出版報紙之外，社內的閱讀、討論、座談成為同學們人格成長、知識成長，激發人文關懷的重要方法。在此必須強調，醫訊因此是醫學院內唯一具有思想、人文活動的社團。我們認為這是塊文化氣息濃厚的園地，是彌足珍貴的。

醫訊問題爆發後，醫訊社的社員藉着合法管道向校內各報社投遞「讀者投書」，以說明事件之原由始末。不料台大訓導處斷然採用鐵腕政策，封殺所有醫訊社社員的投書，只允許校方的「傳聲筒」（代聯會訊）報導「醫訊問題」、代聯會訊以「獨家新聞」姿態，對醫訊社任意蓋棺，而且不惜捏造訪問稿以達成「落井下石」的目的。

虞校長 勸學：

校長

吾校師長向以胸懷寬厚、眼光遠大見稱，是故校風自由，全國無出其右者。

吾輩自幼仰慕，今身在其中尤以此自豪！

然而，十月中旬以來，校內因代聯會普選之事引發爭議，大學論壇社竟以一紙傳單而遭停社等極嚴厲之處分。凡關心學校之同學對此莫不議論紛紛。吾等深恐同學自治精神及吾校自由風尚折損毀壞；而年少言輕；乃敬求校長之計！

查十月十四日論壇社所印傳單，係以與侯漢人論辯為主。其間多有對學校行政單位之微詞；而其未與校政單位對立昭然甚明。以此得咎；莫非學校自始

己立於禁制、反對普選立場？然則若此，學校豈非違反「從旁輔導而不介入」之公正原則？

再者，承辦人謂該文中「解除文字禁」數字將破壞學校形象；足見承辦人亦不遑逆社會給予「言論自由」之崇高價值。然而貽笑衆人者：承辦人竟以此區區數字停止論壇社活動半年。如此而謂學校無「文字禁」，可信之乎？

有謂校規至上，一切依法。然而承辦者捫心自問：校內社團多少傳單印刷物、海報，皆自由製發；僅因內容未涉及權利問題耳！今論壇社以並非「敏感」之校內問題進行爭議，其勇氣可嘉，其分寸未逾；承辦者何以必重罰而後快。吾等所以贊同普選制度，並支持一切有助於校園民主之舉動，乃鑒於十數年來，國運日漸困頓，而百姓富裕，咸以享樂拜金為能事！反抗逆境創造新局

另一方面，以「獨立評論」名聞台大的法學院院刊（台大法言）也收到醫訊社的讀者投書。內容大致表明醫訊社很感謝區訓導處及同學之關心，又言有關「醫訊問題」之是非，應交由大家決定，因此乃請醫學院各班班代表聯署召開班代表大會，寄望由此合理途徑來解決現存之爭執。

法言編輯在仔細研究過投書內容後，認為其立意甚佳，且文字上亦未有過激之情緒性發洩，乃決定刊登。儘管校方之交稿評閱辦法中，並未規定讀者投書必須送審，但為尊重學校訓導單位，仍於次日一早（三月二十八日）即送請校方審閱。

在此之前，法學院之審稿先生（劉健清）於本學期初，即面告法言總編謂：原任複閱委員寇龍華主任（法學院訓導分處主任、商學系教授），因法言上學期末接連兩期以全部篇幅探討普選事件，致其遭「上面檢討」，故本學期授權法學院主任教官徐崇德擔任複閱。既然如此，法言該期之所有文稿乃皆交由徐主任教官負責評審。文稿通過後，則於其上蓋訓導分處主任之印，表示同意。針對此種不按校規程序之授權，法言社長本欲拒絕，要求校方按規定行事，但經編輯會議後顧及校方極可能做出非理性之反應，為求能順利出刊遂不得不作罷。

徐教官複審通過

二十八日下午，法言總編到課外活動組欲取回送審稿件，而負責初閱之劉先生告以，徐主任教官對於醫訊社之投書認為有問題，未予通過。法言總編不知教官刪除之理由何在，乃至隔壁教官室向徐教官說明，並作請益，經過一番心平氣和的討論交換意見之後，徐主任教官同意法言登出該篇投書，但法言編者須於文後附加按語，特別強調此文絕不代表法言之立場。於是，徐主任在投書上鄭重簽名並標註日期，表示已經複閱通過。

至三十日，完稿送抵印刷廠，正待付梓，印刷廠老闆接到法學院訓導處來電，要求停止印刷，並要法言編輯將醫訊投書之原稿呈回，謂寇主任要親自看一遍。法言編輯對校方此舉大惑不解，稿子早

目錄

- 1 • 校長題字
- 2 • 復社宣言
- 4 • 論壇筆記
- 59 • 各社團賀詞
- 社員名單

專欄A:

- 大學論壇社社史 / 劉一德 6
- 論壇的生理及病理 / 紀文勝 8
- 訪老師、同學談論壇復社 / 黃銘傑整理 10

專欄B:

- 學生主權意識的沒落與重建 / 陸以得 16
- 論校園裏的學生權 / 轉載自亞洲人 20

- 23 • 球果與浮萍 / 劉楊王 38 •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 胡適
- 24 • 觀念的溝通——從一份資料看「校園安定」 / 于家成

專欄C:

- 28 • 評七十一年度的代聯會 / 陳強琛
- 30 • 尊重真正的多數 / 謝穎青
- 31 • 選前風聲之一：誰將是下屆代聯會主席 / 張策
- 35 • 選前風聲之二：法代會主席人選初探 / 徐靜波

專欄D:

- 40 • 與攤販談攤販問題 / 李震榮
- 42 • 攤販問題的社會探討 / 林萬億
- 46 • 淺論經濟效益與地攤問題 / 吳忠吉
- 51 • 憲法臨時條款與憲政關係 / 林秀美整理
- 54 • 從選罷法看年底選舉 / 葉志恆整理

3

停刊半年後，大學論壇復刊號（即44期）的目錄。讀者不難看到，停刊並未使他們失去對學生權的追求。還有一個談攤販的專欄、表明他們的觸角已伸到台灣的社會經濟層面。

就審核通過了，怎麼拖了幾天又有問題，得調回去看？但懷疑歸懷疑，法言同仁只有相約隔日一起回校問個究竟。

「對！我就是不信任他！」

三十一日早上，第一節下課，法言社長及編輯五、六人，帶着原稿及原稿紙到課外活動組想找負責審稿的劉先生先了解一下事情的究竟，但找不到。再到訓導分處主任室，恰好眼見寇主任正高聲責罵劉先生，要他立即將法言幹部找來。法言總編先踏進了主任室，其他人隨後，雙方在門口碰面，寇主任就指着法言幹部，怒氣沖沖地要他們立即交出

原稿。社長接口請教寇主任：「您不是授權徐教官擔任複閱了嗎？怎麼——」話猶未了，寇主任已提高了聲調，大吼：「誰授權了！你們把證據拿出來啊！」全體法言編輯全楞住了，「到底怎麼回事，難道我們自己尋自己開心，捏個「授權」的神話出來啊？」大家心裡納悶着。劉先生把寇主任勸進辦公室，法言總編輯跟着進去。劉先生向總編說明，寇主任於學期初交待他，因徐教官是法言的指導老師，法言的稿子就交給徐教官，徐教官同意就算通過了。總編這麼一聽，心想這和授權又有何差別？就想跟寇主任解釋一下，豈知才剛提到那字眼，寇主任就拍了桌子罵道：「喔，你是學法的，你懂！你想教訓我啊！」情況演變至此，總編只好轉換話題，詢問劉先生為何要把稿子調回來再看一遍？劉先生答稱：「醫訊社員在大新社也投了一封公開信，其中出現「壓迫」、「烈士」等不當言詞，總區乃急電法學院訓導處查問是否亦有醫訊投書至法言。寇主任聞訊大驚，乃要求印刷廠停印，原稿繳回。總編至此大體了解了原因，於是非常客氣地請寇主任仔細審查內容，說明這篇投書與大新所得者完全不同。誰知主任拉下了臉，靠坐在沙發椅中，沈聲喝令總編將原稿放下。「這篇稿子絕對不能登！」「不管你怎麼說，我就是不准它登！」總編陪着笑臉懇求主任將徐主任教官請來。「徐教官同意，一定有他的理由，主任您聽聽他的看法好嗎？」「我不要！」總編接道：「主任，難道您連徐主任也不信任嗎？」寇主任滿面通紅，用力拍桌子：「對！我就是不信任他！」

訓導主任的威風

總編卑屈地請求主任撥空看一下內容，寇主任堅決地拒絕，這時，總編也無法了，他向主任說明按文稿評閱辦法，複閱委員不同意之文稿，得請院長審閱，上學期法言之所有稿件亦皆經過如此處理。當總編甫拿起該投書，寇主任站了起來，威脅道：「你敢越級上報，我記你大過！」「你敢踏出訓導處一步，我馬上就記你！」在這種恐嚇下，總編不得不轉回身來，拜託主任冷靜下來，看過內容再做決定，但寇主任仍重覆同一回答。總編不斷請求，並提出疑問，想了解究竟為什麼絕不能登醫訊投

書。寇主任瞪大了眼，對着總編吼出了他最後的答覆：「我叫你登什麼，你就登什麼！」總編完全絕望了，他決定不登，以免再生爭執。他告訴寇主任他的決定，同時順手收起了放在桌上的投書。豈料，寇主任突然緊張地喝道：「你把稿子放下來！」總編一頭霧水：「主任，我答應你不登，但把稿子退回給投書者應該可以吧」寇主任再度施出了他的絕話：「你敢不交出來？你不交出來，就是違抗命令，我就記你大過！」天啊！怎麼這樣又是一個大過！雙方又僵持住了。劉先生在旁不斷對總編使眼色，不停的勸總編放下稿子，聽主任的話。總編不得不放下。這主任好似鬆了一口氣，但隨之又發佈命令了：「出去！你們通通給我出去！」

以後，社長進入辦公室想勸服主任，也挨了一頓臭罵，謂因上學期法言檢討普選事件，使其遭「上面」檢討云云。經過一個小時，總編被徐主任教官請去，婉言規勸總編換版另登新聞以填補完稿紙上原醫訊投書。同時寇主任在原稿上加批了下列文字：「醫訊事件是非未明，法言不便刊登……」

從一開始，校方就以醫訊問題是醫學院的事，法學院不要管為藉口來搪塞法言編輯，就如同上學期製作普選事件專題時，校方謂：普選事件是總區的事，我們法學院不要理，對前後兩者都是同一說詞。

法言編輯此次完全按校規行事，無一絲差錯，此點訓導處職員亦承認。但却遭到這種下場。校方自己頒訂的法規，訓導人員却成了最大的破壞者，他們的眼中毫無法紀的存在，但憑個人私意為所欲為，動輒以記過要脅。法言編輯總辭，無形中是學校方面又一次策略成功，繼醫訊之後，順便也解決了法言。

餘波盪漾

此時，台大國民黨黨部發現校園狀況不穩定，為了打擊自由派的學生，於是散發傳單說中共（共匪）最近投入二十萬美元在台大搞學生運動，破壞自由派學生形象。

校園氣氛的熱絡，也促使一批高山族台大學生發起「高山族自覺運動」，出版刊物為「高山青」，表達他們對山地政策的不滿。

「民主台灣」不是一個新聞性的刊物。我們希望較偏重於全面的分析與探討，追求對台灣問題較根本性的認識。

雖然如此，但是重大新聞往往是社會基本問題大冰山的露頭，是了解台灣社會的着力點，更是引起廣大群眾關心的話頭。這個專欄期望簡介大冰山的露水面，更希望能研究埋在水中的全貌。每則我們將簡單敘述事件真相與脈絡，摘要島內反應與意見（以黨外或民間意見為主），並做一些短評。

取材與評論力求站在多數受壓迫人民的立場。是否做到，需要讀者的評判。希望您來信。

—— 編者



學生權 台大 風雲

沉靜多年的台大校園，近半年多來，又開始風雲湧現。尤其是今年六月間台大代聯會主席改選，破天荒地由一位非國民黨籍的吳叡人當選，一時引起各方注目。黨外刊物紛紛報導，贊揚這是民主花朵開始在台大校園開放。

吳叡人的當選並非憑空而來的。早在去年秋天，前「大學論壇」社社長劉一德曾於新生代雜誌撰文：「學生意識的沒落與重建」即已開端。隨後台大四個學生社團：「大學論壇」、「大學新聞」、「台大法言」、「台大醫訊」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按，台大代聯會主席係由各班代表選舉，絕大多數學生每年註冊時要交會費，却無權投票），認為大學生關心社會不應只在參與黨外助選活動，而應放在身邊校園內的學生權。這些活動引起學校訓導當局的緊張與鎮壓，「大學論壇」因而停刊半年，數名學生被記過。（詳情請參閱本期文章：台大人「陳七中的春芽」）

推動人雖被處分，但影響却深入許多學生心中

。終於到了今年六月間，國民黨第一次失去了代聯會主席的位置。

國民黨的失敗或許激怒了那些訓導、安全人員。六月底盛傳數名最活躍的學生被安全單位約談。一時風聲鶴唳，許多學生都躲起來。

據悉，今年二月廿八日台灣一些校園發現一些不明來歷的傳單，內容提到二·二八事件。有些傳單署名「台灣獨立黨」。國民黨當局正愁無法破案，遂指稱這個傳單係這些爭取學生權的學生所參與製作的。

本會輾轉收到一位被約談學生對此一問題的答辯書。由於島內未曾刊出，特全文刊登於後。

夏潮論壇第七期社論指出，爭取「學生權」是一個很自然而單純的活動，其對象只在學校的官僚作風。這不僅與「叛亂」無關，而且連「運動」也說不上，只限於少數幾個先進學生。如果國民黨當局連這種合理合法的活動也要加以任意約談或逮捕，則非一個以民主自許的政府所當為。

關於有關當局所指稱，今年「二、二八」所發生之「傳單事件」中所謂的「台灣獨立黨」，係與台大學生劉一德等人在今年二月初寒假期間之「組黨行動」有關，實一誤解。實情並非如此，有關「組黨」情形，大致如下：

今年寒假期間，台大、政大、東吳三校學生卅餘人，曾假新店花園新城舉辦露營活動。由於是日下雨，故露天露營活動臨時改在室內朋友處舉行。原訂活動二天，首日為演講活動，曾邀請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前「進步」雜誌編輯魏廷昱，政論作者汪立峽蒞臨講演，隔日即作自由活動。會中，主辦人劉一德提議大家嘗試作一「組黨遊戲」。因參與該項活動者，多係各校法政科系之同學，對當前本國議論最多的「組黨」問題，定有許多意見。同學們可憑耳目研究、觀察心得，提出組織政黨之需要。然政黨之形成，各有不同之因素。組成份子與黨綱，亦有各種不同之需要與不同之條件；意欲形成之政黨，必有不同之性質與風貌。透過大家的意見，可反證今日「組黨」論者諸君意見妥當與否。

為此，許多同學即紛紛提出組黨意願。有多人聯合組黨者，亦有個人獨立建黨者，亦有多黨整合成為單一政黨者。觀其建黨原意，有本諸個人隸屬宗教，提議組織教會黨，有時工農福利被忽略而倡議組織工農黨，有不滿意當前執政黨之施政，欲做國民黨員另組國民黨，亦有鑑於生物界之不平等，禽獸受役於人類，而欲籌組豬狗牛黨者，有正經、有詼諧，然皆寓有深意，充分流露出大學生觀察事物之敏銳。整個活動，純係一遊戲，外人誤傳為大學生私組新黨，與實情不符。



山地

青年 的

覺醒

台灣的高山族從來是最受壓迫的少數民族，而這壓迫的事實也最罕被注意的。今年五月一日，一份手抄本的刊物「高山青」打破了這個沉寂。這份由山地青年自辦的刊物，在創刊詞上，沉痛地喊出：

山地青年朋友們！試問：

懸殊的貧富差距何時才能拉平？

實質的平等何時才能獲致？

真正的尊重何時才能被受？

山地青年朋友們！再試問：

如果我們不背負起山地的十字架，誰來為我們背負？

山地青年朋友們！奮起吧！

沉睡了三、四百年，是覺醒的時候了！！

創刊號主題文章：「我們必須要說！——台灣高山族正面臨著種族滅亡的重大危機」，文中回顧高山族歷受明鄭、葡、西、荷、清、日及漢人的歷

迫，於今「高山族的文化、語言，在平地強勢消費文化和強勢語文的影響下迅速趨於消亡」，於是「男人成為高勞動力、低所得且無保障的工人，女性則大量向著平地色情行業的深淵淪落」。這些，再加上「社會體制的崩潰瓦解，在在顯示，台灣高山族正面臨著種族滅亡的重大危機。」

文章接著指出，解救滅亡的危機，只有依賴山胞自己的覺醒。因此，提倡「台灣高山族民族自覺運動」，描出下列七點目的：

- (一) 激發高山族的自覺奮起，
- (二) 反對同化政策，
- (三) 主張尊重、保障台灣少數民族之基本權益，
- (四) 普及山地社會之政治教育，
- (五) 力倡高山族之團結，
- (六) 力主高山族經濟利益之獨立，
- (七) 革新山地社會。

另一篇文章：「『若是如此，不如不辦』——山地大專學生愛鄉服務研習會之我見（一）」批評山地服務像是一場「龍山寺的大拜拜」，「年輕人談得問題太銳利敏感，主其事者便群起而攻之；年輕人避重就輕，主其事者則馬屁連拍，滿室臭氣。」並開列了七個專題系列，如下：

- (一) 台灣高山族從那裏來？
——編纂「台灣高山族發展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 (二) 平地人說：我們佔盡了便宜，吃點虧又何妨？
——這樣的「山地政策」！
- (三) 我們的民意代表到底在幹什麼？
——是國民黨的御用工具？是炮灰？抑或是政治花瓶？
- (四) 靠山吃山，會不會餓死？
——論「山地保留地問題」
- (五) 我們的女同胞還要讓他人「蹂躪」到何時？
——山地少女賣淫行為之初探。
- (六) 「抱歉！我不會說山地話，也不會唱山地歌！」
——復興中華文化是否必須犧牲山地文化？
- (七) 人活著不僅是爲了麪包，還要追求價值。

高

山

青

本期專題：

我們必須要說！

台灣高山族正面臨著
種族滅亡的重大危機

——山地讀書人別再裝睡了！

正如戴國輝先生指出的，漢人在台灣開拓中是沾滿了高山族的鮮血的。而尤令人難過的是，今日雖然直接的屠殺不存在了，但透過各種政治手段，各種政策、強勢的消費文化等等，高山族的命運並沒有比以前好多少。相反地，在這種「看不見的手」的操縱下，山胞正日趨消亡。

山胞的自覺是在令人歎疚下的一點希望。誠如「高山青」上所說的，山胞的解救一定要靠自己。新一代的年輕人中，也許有少數具有正義感的人，可以引爲朋友；但喚醒全體山胞的覺醒與團結，才是山胞免於消亡的基礎。

我們在海外者，接觸山胞的機會不多，然而正義的事情總是要互相支援的。關心台灣的朋友們，也應隨時注意事情的發展，儘可能地聲援，以造成社會普遍的認識。缺乏這種普遍的認識，山胞是難以自覺自救的。在缺乏自覺的努力下，強勢消費文化、政策等這種「看不見的手」將會繼續吞噬山胞民族的生命。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討論會專輯

前言：

七月二、三日，本會舉辦夏令會，會中有個討論會，討論下列幾個主題：

1. 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 戴國輝主講
2. 普適體系、現代化、演化、與革命。 任覺民主講
3. 中國對台政策與台灣人民反應 李哲夫主講
4. 台灣的官僚壟斷資本 柳白主講

每個主題在主講人作一小時左右報告之後，便進入熱烈的討論。由於每位主講者均是學有專長，富有研究的學者，使這個政治性的討論增多幾分嚴肅與學術氣氛。

本刊整理了這個精彩的座談會錄音。由於討論熱烈，遠超過預定時間，錄音帶不夠，第4主題的討論部份付闕。

本期稿擠，第2主題整理較遲，將延至下期刊出。

台灣史

的經驗談

戴國輝

戴國輝先生係台灣桃園人。1950年入台中中興大學農經系，1954年畢業，1956年赴美留學途中，為其二哥勸留日本，改入東京大學農經系，於1966年得博士學位。其後在東京經濟發展研究所、立教、東京、皇族等大學教授歷史、社會學等。

戴先生學術著作豐富，已出書八冊，包括1930年台灣高山族在霧社起義事件研究。他並致力於收集、整理有關台灣史的各種資料，1970年於東京組織一個台灣史研究會，出版學報與通訊，並舉辦各種討論會。

戴先生於學術研究之餘，也十分關心台灣的局勢，支持台灣正義事業，關心亞洲人民的和平。去年日本政府刪改歷史教科書時，戴先生以一個非日本人的身份，在日本「世界」雜誌上發表一篇：「給亞洲鄰居——日本——的諍言」（1982年10月號），無畏地以一個曾被殖民過的立場，批評日本過去的殖民主義，也批評今天「發展」亞洲國家的「新理論」，引起日本輿論注意。

戴先生受加州大學之聘，於今年三月來美國研究訪問一年。六月底，他應芝加哥大學遠東系奈地田教授之邀來訪芝城，支援會因而有幸請來參加座談會演講。

本文係戴先生根據演講錄音整理稿重新潤色修改，並增列了少部份資料。戴先生在百忙中細心地修改這份長文，敬業精神及合作態度令人感佩。文中霧社事件照片係錄自戴先生原書，照片說明也是戴先生提供的。小標題則是編者加列，以助讀者閱讀。

—— 編者識

主席，我所敬愛的各位鄉親。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次的盛會，並能上台向諸位做點報告，感到非常榮幸。鄉弟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客家人，閩南話大概可以聽懂百分之九十。這個可能是得力於我太太，因為她是有四分之三的閩南系血統。在日本我遇到什麼人就講什麼話，只要對方的話我能講的，

我是樂於那樣做的。

我並沒有只把閩南話、福佬話當做台灣話來形容過。鄉弟認為台灣話應該包括有高山各族的方言類，客家話以及閩南話也就是福佬話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有些「台獨」元老已把閩南話與台灣話畫成等號，甚至於把它定為他們所主張的「民主國」的國語來看待。這個對我們客家系台灣人來言，的的

確確「不是個味道」的。我認爲那種看待是完全錯誤的。不過我倒很喜歡閩南話的一句話，也就是「騙吃，騙吃」，我在日本已「騙吃」了日本朋友廿八年，授課、寫作、上電視、演講用的都是日本話。但今天不能用日本話，也不準備「騙吃」，只好老老實實向諸位交代並請教罷了。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很慚愧，過去我用中文發表的文章實在太少。孝信兄問我，有沒有什麼可供鄉親們閱讀參考的，在身邊只有一件中文一件英文的，我請林孝信兄幫我影印出來，這些原本仍是在芝加哥大學找出來的。未到美國時，我沒有想到會有鄉親來找我麻煩，要我獻醜的，所以事先沒有準備，這一點要向諸位央請原諒的。

未講本題以前，我先對這兩份參考論文稍爲做一點說明。

第一件是「台灣風物」雜誌所譯載的「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這個翻譯事先我沒有得到通知，等到譯完後譯者交給我一份譯稿的拷貝。但我一看很傷心，譯的太糟。一方面因時間匆促，另一方面無從改起，只好把它懸在一旁。沒有想到終於在第三十卷第四期被刊出來了。話得說回來，這一篇原論文是在一九七〇年發表的，當年帶給日本學界一些衝擊，修正了不少日本人，甚至於台灣朋友對台灣歷史的一些看法。

批評日本刪改教科書

另外一件英文是「Advice for Japan as an Asian Neighbor」。這個該翻爲「給亞洲的鄰居——日本——的諍言」的原文是去年九月間發表的。當時日本恰好在鬧「篡改教科書」問題。文章是刊在「世界」（岩波書店發行）的一九八二年十月號（日本的月刊雜誌通常是提早一個月發行）。

我不敢自鳴得意，更沒有臉皮自我膨脹，但這篇文章是得過好評的。或許是因爲這個，芝大的一些日本人學者把它翻成英文，小弟這一次來芝大訪問也是因爲這篇論文受了注意，所以才被邀請過來的。他們翻得不錯，但有二、三個地方我不滿意，

據說他們要印成書，斯時我當然會把它修改過來的。雖然這兩件都不是完整的論文，但只好暫時硬著頭皮請諸位過目參考就是了。

「我為何研究台灣史」

現在，言歸正傳開始我的報告。今天我分三個大綱目來講。第一個是「我為何研究台灣史」，第二個是「我（我們）的少少成果」，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在日本我們所組成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同仁而言的。第三個綱目是「來美以後的感觸」，我準備藉第三個綱目向諸位先進請教並一齊來思考一些問題，希望能暫時做出些結尾話。

剛才小弟已提過，我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他優點，當然也有不少的缺點。有意識的客家人往往具有甚爲強烈的中原正統意識，有時偏激一點的客家老鄉會自稱這一種意識爲「客家精神」。老實講小弟本身多多少少也有這種傾向，帶有不知不覺被塑造出來的中原客家意識。從小家人就期待我，後來

病人……百分之九十是營養不良，公共衛生未完備，教育水準過低而惹起的。既然中國人百分之八十是靠農吃飯……只要能善於解決農業問題……等於減少了一半以上的病人

這我唸醫，我始終反抗，認爲一個醫生，尤其是開業醫生在自己的小醫院裏，一天、一年，甚至於一生究竟能看多少病人，能救活多少人？而這些病人除了特殊的病例（特殊的病人往往私人的小醫院是無能爲力的）以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營養不良，公共衛生未完備，教育水平過低而惹起的。既然中國人百分之八十是靠農吃飯，屬於農民地位的話，中國的基本問題當然是在農業問題上面。只要能善於解決農業問題，解決窮困，克服我們的落後性的話，那就等於減少了一半以上的病人，所以我就選了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農學院）唸它的農業經濟系。匆匆忙忙地畢了業，受完了預訓班第三期的軍訓，我就出了國。這是一九五五年秋天的事。原

來想的是留美，已申請到印地安那州立大學（昨天我頭一次跨了印地安那州界，有不少的感慨）的獎學金，準備來學美式大農經營，尤其是機械化稻作農業準備將來回國對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事業能奉獻出些能力。

考進東京大學的因緣

出國留學，我先到東京看我二哥，他長我十歲，非常疼我，我們已經十年沒見面了。他到日本留學以來，除了暑假回台省親一次外，因戰爭無法回家，光復後他一直沒有回台過。我二哥希望我留下來好好唸幾年書。但我却討厭日本，罵日本人，也不能原諒日本人。

我哥哥反而勸我說「我們得好好研究日本與日本人，你我吃了日本人的苦頭甚多，我們當然可以討厭他們，可以罵他們，但是那種情緒化的所作所為並不屬於社會科學的。日本人在台灣，在大陸以及東南亞作了不少壞事，他們的的確確胡作非為作出違反人性的事情。但我們得知道那些日本人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體制下也就是說，在一種非正常的體制的框框之下做出來的。我們是否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其實日本的老百姓也跟我們一樣是受害者的呀！廣島、長崎的原子炸彈帶來的災禍

（過去日本人）的確作出甚多反人性的事情。但那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體制下，在一種非正常體制的框框之下做出來的。日本老百姓也一樣是受害者。……你該克服情緒化的思考，原諒「過去的敵人」。

是悲慘的，這些慘禍多半是由日本老百姓來承擔的呀！你該克服你的情緒化思考，同時你得原諒「過去的敵人」，這兩點若是你自己做不好或者做不到的話，是沒有資格搞社會科學的。最好改行。

我被二哥說服了，很幸運的考上了東京大學，當時我對台灣以及台灣史是有些關心，但並沒有太濃厚的興趣。所以我第一篇論文為「稻作農業與農

業機械化」，第二篇為「中國農村社會的近代化與家族主義」是探討家族主義（familism）如何阻礙了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業的發展。不但不搞歷史，連研究對象都不屑放於區區小台灣。心理上一直囑咭了有這種不甚成熟的「感覺」。現在想起來真有一點可笑。

慢慢走上「歷史」的插曲

直到了準備寫第三篇，也就是博士論文時才慢慢走向歷史，同時把對象拉回海峽這邊的「寶島」來。這一段心路歷程是有個小插曲的。前年剛剛退休下來的徐慶鐘博士（前國府行政院副院長），他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邀請我回台服務，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我們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請他來開座談會，因他是我們台灣人第一位拿到農學博士，亦是我們龍潭鄉本籍的客裔人士，雖然他不曾說客家話，我們都很尊敬他。他問我準備寫那一種題目的博士論文，我回答準備寫中國大陸的農業問題。他說，你為甚麼不研究台灣農業，我說台灣太小不夠味道，他笑一笑，「小是小，是我們鄉土呀！」，他說。

大概晚了半年左右，當時還在農復會當技正的李登輝兄（現在的台灣省主席，當年他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也來了東京大學訪問。我們東京大學農學院的中國同學也請他來座談。散會後他邀請我到他住的旅舍，我們喝了茶、聊了天。他也問我，你準備以甚麼題目做博士論文，我同樣地回答他，雖然對台灣有關心，但總認為台灣太小，不過等等再說。李學長勉勵我說，「真正研究台灣經濟史的人材太少，老戴請你多多考慮，用一點心研究台灣經濟史好不好？」

下功夫研究台灣史的原因

他們兩位學長的勉勵，當然只是後來促成我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一少部分的理由。真正喚起我對台灣史下功夫的原因，現在整理起來不外是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當年在東京台獨運動主要人物有廖文毅、邱永漢、王育德等人。他們的主張當然不會是百

分之百是錯的，並不至於百分之百沒有人去同情它的。但總而言之，他們的史觀，尤其是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看法以及評估很多地方叫我不能同意。後來我發現「媚日」不限止於他們台獨人士，甚多台灣知識份子犯有同樣的毛病。這可不得了，我認為如此下去將自誤誤人，將給台灣以及中、日兩國國家都可能帶來災禍。

歌頌殖民主義的危險

第二，台獨的言論同時也可能給日本人帶來了禍水，台獨認為日本給台灣帶來了資本主義，促進了現代化云云的話，日本人一般聽起來很順耳，很可能就變成了甜言蜜語，這個可要害人不淺。為害的範圍很可能還要擴展到東南亞。

這個話怎麼說呢？一般來說，日本的一般老百姓是較為單純，心機也較為善良的。因為他們的社會不像別的國家那麼複雜，民族、語言、宗教並不是多元的。所以較易受騙，容易上煽動者的當。

一般日本人若是認為殖民地統治能做出好事，並且有「曾經受過統治的民族」出來見證時，日本老百姓向那裏去學歷史的教訓，很可能他們還會重蹈他們的老路子也說不定。如此的話，當然亞洲全域難保和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也無法樹立。

我的憂慮從台灣出發一直到亞洲的和平。我認為，我們台籍人士假若沒有搞好台灣史的話，將會自誤誤人，同時也擔心台籍知識份子因不諳台灣史的真相而被借為「殖民地統治史的見證人」而害己禍人，並且可能給亞洲帶來了不幸，所以我立志修台灣史。

中共對台灣的認識淺

第三個因素是與大陸有關係的。在一九五五年前後，當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我很好奇收集並閱讀大陸出版有關台灣的書籍。中共從一九五〇年初期大喊它的「解放台灣」，特別在我們受訓期間（一九五四年秋至一九五五年夏），台灣海峽緊張過一個時期。不待說小弟也與其他有心人一樣對台灣海峽的情勢是懷有甚大的關心的。

當年我能收集到，能閱讀到的差不多，是小冊子之類，很難找出一部經過學術研究所推出的文獻。它們除了論調差不多以外，有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發現，編著者連漢族系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與高山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沒有搞通的實例。這個可叫我傷心並帶給我無限的失望。幹部級如此的話，我們數億大陸平民對台灣的認識一定不會太深，也不可能全面的。他們很可能隨口在空喊「解放台灣」而已，其實台灣究竟在南北或在東西，一般老百姓很可能不甚了解。中國太大，大陸的「政治掛帥」太猛，老百姓沒有太多的空間來認識台灣的真相。我發現這種情況值得憂慮，認為我得好好研究台灣而把成果呈獻給大陸同胞，最好能幫一幫他們開一開眼界才對。

下面我繼續講我的第二個綱目。我的野心是蠻大的，但工作進展過慢，成果也微不足道。今天只好藉我（我們）微不足道的「成果」來道出我研究台灣史的心得。

研究台灣糖業史的目的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前後的事，我終於決定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暫定為台灣糖業史。我最大的目的是想搞通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真相。我們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是依糖、米兩項農產品為中心而展開的。尤其以糖業為最重要的榨取手段。

很多日本知識界的朋友，包括以馬克思經濟學

一般日本人對侵略中國大陸是有罪惡感與贖罪感，但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却少有。原因何在？

的方法來看問題的一部分學者先生們，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把糖業搞起來，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所以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是成功的，是少有罪過的。

據我廿八年的日本生活「體驗」，一般而言日本人對侵略中國大陸是有他的罪惡感，同時亦具有他的贖罪感的。但他們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却少有罪

惡感和贖罪感。原因何在，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現在我可以把我整理出來的未成熟的看法向各位披露。

第一，「健忘症」是人的通性，尤其是加害者往往不願記取有關因自己的加害而惹起的不愉快的一切史實。這種心理的作祟，加上光陰的無情流逝，亦加劇沖淡一些歷史的悲劇面貌。台灣被納入殖民地早於九·一八，更早於七·七，因而後生日本人易於忘記。隨日軍在清末期侵台的一輩也早就不在世了，這個也幫了他們的健忘。

第二，日本史書一直以「割讓」來敘述日本統治台灣的契機。清朝既然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個該是合法的，不能視為侵略。日本人如此主張。

「負」的歷史意識

第三，第一代台獨人士的言論，尤其是邱永漢、王育德兩氏的言論給日本人帶來「負」的歷史意識。他們以東京帝大的校友，以台灣人的精英（elite）姿態立論著書來肯定日本帝國主義給台灣帶來了資本主義，給台灣現代化奠了基，給台灣農業帶來了現代化水利施設——好比嘉南大圳等等。這些言論概以日文發表，它不但變成了「媚藥」還幫助了日本人，把他們原來已經很稀薄的殖民地統治罪惡感沖淡了不少。

我沒有意思苛求日本老百姓，他們的文化水平在平均線上的一般老百姓，不管他是屬於何種民族、何種人種，我想人人都不願第三者來指摘自己的父祖概為敗類，父祖的一切事業都被第三者否定，一筆勾消的。

儘管人的常情是如此，但我還是力主歷史問題是要交代清楚，要說清楚才對我們未來開創共同的新歷史有所幫助的。因此我點出，第一，我們中國人（包括台省籍民）並不是第三者，就近代日本、中國關係史來言，我們是不折不扣的第二者或是當事人，我們有權揭開歷史的真面目。如此做不但對我們有利，對日本人也具有幫助的效能的。

第二，看待與評估殖民地統治史＝被殖民，被支配的歷史，我們須要全面地，從殖民地支配的動機開始分析，一直到統治的具體過程和結果來做整體的調查、研究才稱得上社會科學的。

評估殖民地統治的功過

第三，只從殖民地統治遺留下來的「成果」來評估殖民地「母國」的功過是不充分的。就台灣而言，日本人把糖廠留下來並不是他們自願的。日本戰敗了，被逼捲了鋪蓋滾回日本，萬不得已留下糖廠這才是真相。去年暑期在日本九州開幕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曾經引起一項不大不小的爭議。有一位留美回去的日本人教授，他在會場為了敷衍討好日本文部省，主張，日本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行為不能統統算入罪狀裏頭去，好似日本軍也訓練一批人才，他們目前活躍於東南亞諸國是個好例子。鄉弟義不容辭地站了出來，很冷靜地反駁了他的言論。

我說，我們都知道日本名古屋戰後所建的地下街，都市計劃是非常漂亮且成功的。因為名古屋被美軍B二九炸平而後有所新建。我問當時在場的諸位，名古屋市民該不該感謝美國空軍，需不需要請美軍再來轟炸一次。還有日本醫學界有關「原子彈炸彈病」的醫療技術水平是冠於世界的，我不相信日本人將來會為了再提高「氫彈受爆病」的醫療技術水平而央求蘇聯學美國炸廣島和長崎一樣的來轟炸東京，造出病人來貢獻日本醫學界作研究。

我本人是在台灣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的。家叔唸了後藤新平所創立的台北醫學校（後

後藤在台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在搞慈善事件，更不是為了台灣島民的真正健康，而是為日本資本家提供健康勞動力。

昇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為開業醫生並賺了大錢，在個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許該感謝後藤新平也說不定，但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言，絕沒有感謝後藤的道理。因為後藤在台灣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為了台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而來辦的。他的真正目的在於，為日本資本家準備健康的投資地

，為資本家提供健康的勞動力等非靠台灣人醫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台不久就開辦醫學校。模仿英、法諸國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樣。諸位若不相信我的話，請你們想像一下，「瘴癘之地」有何資本家肯前來投資，若殖民地的基層勞動力統統是病弱不堪者，要從何種人的勞動來榨取剩餘價值呢……。我們有良知的台灣人不至於感謝日本人的統治，更不會再度邀請日本人當統治民族，重新光臨台灣的……。在場的日本朋友吃了一驚，與會的外國學人們給我鼓了不少的掌。會後他們還特地跑來誇獎鄉弟的道德勇氣。

話有點說遠了，其實並沒有離譜。我能得出如上的邏輯，主要得於我寫成了「中國甘蔗糖業史」的心得而形成的。

馬關條約日本要佔台的經濟原因

當我進行台灣糖業史的研究過程時，我整理出來，日本當年的政權為何在「馬關條約」向李鴻章主張侵占台灣、澎湖的真正經濟原因。日本明治政府，當年為了蹈襲諸先進西歐帝國主義奪取殖民地，確立它對外擴張勢力的軍事基地外，日本當權派是另存有它的經濟理由的。日本資本主義在明治維新以後漸漸脫穎而出，它為了搞起資本主義工業化，需要一大批外匯來向西歐購進新式工廠設備。

但它的國內市場因資本主義經濟的釀成，慢慢地亦形成新的有關「吃的」消費構造來，因而年年得從外國輸進一大批食糖，花費它廿五%的外幣支出，它的主要輸入市場之一是我們台灣。

諸位千萬別吃驚，大概我不會記錯，我們台灣的糖商在日本橫濱開它的分行是遠在一八七三年（清朝同治十二年），是明治六年間的事。這個糖商即為陳中和一家，它的後裔就是光復後在高雄縣市作他們的地盤而活躍的陳啟川昆仲。

台灣當年已是「寶島」呀，我們千萬不能被當權者、統治階級、體制派文、官人給台灣及台灣居民所套的「瘴癘之地」、「化外之地」、「三年小反五年大亂」或「好亂、好鬥成性」一些「框架」語迷亂了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老早調查清楚台灣的社會經濟，他們在侵台以前和治台早期很少提到台灣是不毛之地。其

實日本人自明末清初已從鄭成功一家治台、開拓台灣、振興台灣糖業得到不少利益。鄭家三代人能依靠「彈丸之地」來抵抗還沒有腐敗，正在興旺的大清帝國，它的主要財源主要靠的是輸出紅糖的。當年的紅糖除了輸到日本外還輸到波斯（現在的伊朗）。國府中央剛遷台不久的局面有點相似於鄭家治台的歷史局面。

我們清朝的台灣糖業已具有相當規模的基礎的。日本人絕不是憑空搞起來的。

奪取台灣的頭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的盤子尚是脆弱而淺薄的。狡猾的日本商人以及當權的財政官員，他們並沒有忘記了台島的股商和洋行買辦等人的資金。日本當局動用了台島富庶人家的資金參入了他們的糖業資本，一方面運作了台島土著豪商士紳的資金搞他們主導的工業化，另一方面驅策了我們台籍的勤勞階級盡其所能榨取了他們用血汗產出的剩餘價值。

在我的台灣糖業史研究過程中，我不單單發見了以上我所報告的史實，我還發覺到台灣糖業有它本身的前史，有它的「根」。因而我開始追索到海峽對岸的福建，為了弄清楚福建糖業，我繼續探索古籍，然後我遇到「本草書」之類書以及「糖霜譜」等的貴重古文獻。「糖霜譜」還告訴了我，四川

鄭家三代抵抗還沒有腐敗的大清帝國，
主要財源靠輸出紅糖。

的糖業早在十二世紀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不管是在製糖技術或在社會經濟的水平。

我的博士論文終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印成書，書名為「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這是我生平第一本書，它幫了我不少忙。我雖學農，但我能在日本的立教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謀了一個教席，百分之六十是靠它的。它不但是世界第一本有關中國甘蔗糖業史的書，它敘述了七世紀到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個側面。我引用了不少內外古籍因而得到學界的肯定。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下面我繼續要談的是我的小論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這篇文章雖然公刊於一九七〇年，收錄於「仁井田陸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東京勁草書房），但定稿是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

仁井田陸博士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是中國法制史的權威。一九五六年我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科碩士、博士班聽過他的課。他在東京大學的受業學生和後期同學們（他們多在日本國、公、私立大學占有重要的教席），大概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爲了紀念他的退休（東京大學是六〇歲退休，因爲東京大學是國立他們叫退休爲「退官」）而籌備公刊「紀念論文集」三大冊。但退休不久的他很不幸地得病於英倫（他退休後受聘於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送回東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開刀，藥石無效謝了世。因而書名才改爲追悼論文集。

很幸運地公刊了我生平第一本書後，得到了好評，籌備仁井田陸博士紀念論文集的委員先生們知道我是仁井田先生的受業門生，故邀我寫一篇論文紀念他的「東京大學退官（休）」、並祝賀他的「還曆」，六十大壽。

鄉弟說了這麼長的「多餘的話」爲的是對歷史要說個明白，所以如此嘮嘮叨叨的。請各位多包涵

能夠在「仁井田陸博士紀念論文集」發表論文，當然是光榮同時也是難得碰上的良機。這裏所謂「良機」含有公私雙重的意思。有關「私」的部分我不必「點睛」，但有關「公」的重要意義我非得詮釋一番不可。

先前我已經稍爲提過仁井田先生是位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世界性權威。紀念他的論文集很可能也可乘他的權威受學界注意並將受藏於各權威圖書館，如此的話當然附帶地也可給我們帶來好機會。我們可以藉這個良機來向日本以及世界來揭開，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一部份真相。

我開始撰稿準備詮釋，爲何日本帝國在台灣能夠「留下」較有規模的「殖民地遺產」。我開始整理日本治台前期，也就是清朝末期的社會經濟概況。

一般日本人大多數都不知道，我們台灣早在日本侵台以前就有了鐵路，煤礦的開採，與對岸福建

之間已敷設有海底電線等等。

日本學界，知識界向來不甚注意台灣。他們認爲台灣只不過是大中國大陸的一個「小盲腸」而已，可有可無，無關重要。加上他們所普遍尊重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文物大可在大陸尋找，不必在「國內殖民地（明清時期的台、澎兩島可當中原大陸王朝的國內殖民地邊陲之地來看）的台灣來撈。人人都了解，「殖民地」是不會存有或者是很少有古色古香的文物和文化的。

日本人打敗了帝俄，乘機向「滿洲」侵透，隨著日帝擴張它在大陸的勢力圈後，他們逐漸消失對台灣的好奇和興趣。日本人已認爲台灣是他們的不沉航空母艦，對他們來說，台灣篤定地是屬於他們控制的，不可能變更其「存在」的。如此一類的念頭普遍存在於日本人的思考裏頭。這種思考當然不會促進他們的學界去研究台灣史，去研究日本治台以前台灣的的確確有過它本身的「前史」的。

我寫「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來詮釋這個「前史」。讓人人能知道，日本人帶進台灣的資本主義，一些現代化的設施等等並不是從空中飛下來的，憑空創造出來的。我用了甚多的資料，包括日本人在未治台前所發表的有關台灣的報告文章之類，來證明台灣並不是人云云云的「不毛之地」的的確確治台十年以後的日本人，居心不良，爲保持既得利益，爲了自誇其成就，爲了向第三者討回其花在治台的「血汗」功勞，而盡其所能醜化台灣爲「化外之地」、「瘴癘之地」、「三年小亂五年大亂」的難治之地的一些虛像。

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爲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能的政府，爲何日本人在朝鮮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爲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爲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台灣島民雖被逼當了「

客體」，飽嘗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台以前已在台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作合情合理的解釋，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台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魂的台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

但這個「炸彈」好像效果不甚大，在這個時候還有位高伊哥先生寫出「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生根」第八期）一文，我覺得我們台籍知識份子病入膏肓與問題的嚴重。俟後我們再給高文來一下論評。

繼「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我連續發表了「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有關台灣習慣調查的札記——」、「戰後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清末期台灣農業的實貌」等等，以及參加了「台灣經濟與日本資本的進出」等座談會，繼續我對日本和台灣關係史的詮釋。現在時間已不多，有關我個人的研究心得報告暫時就此結束。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諸位大概已經過了日吧！我在櫃台上展覽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一集到第四集的全套和鄉弟編著的「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另外一本是我的第一位學生若林正丈君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這三部刊物可以說是我們在日本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同仁的小小成就。可惜的是統統以日文書寫，不能供給鄉親們作為參考。

有關我們研究會的緣起，我已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的末頁「補白」上道出一些。我們的研究會創始於一九七〇年初夏，本來沒有正式會名，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會長，只有輪流義務承擔的「事務局」以及年報的編輯委員會。

我們的會一貫保持公開，我們沒有會章，但我們有共同的默契三項。

第一，我們同仁不作假，不作虛，不作「排場」。

第二，我們主張不受「正統」和既存的「框架

」的束縛，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顯能保持相對的自由，我們同仁願能驅使富有彈性的思考。

第三，我們反對任何人給研究會帶進「政治」。

同仁們，曾經要我寫創刊辭，但我力主排除形式主義，反對「排場」而改用「補白」塞了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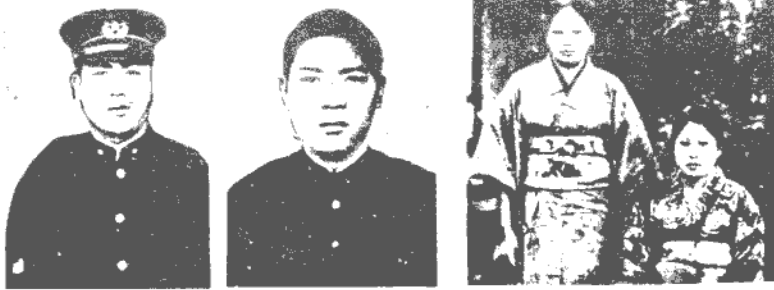
我們沒有接受過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的資金援助，每一個月開一次「月例研究會」，除了每年八月休一次暑假外，差不多沒有間斷過。事務局每個月選出通訊頒佈給會員，有一些台籍同仁出了一次席，交了通訊郵資以後不會出席，當然不作報告和不參加討論。但他們却可藉我們的通訊所載的「學界情報」來向台灣或者我們同仁少有機會見到的中文刊物發揮他的「文才」。最近我們察覺到，我們不反對有關學界情報的廣泛傳播，但我們覺得那些「不參與」的台籍同仁，如此下去很不易樹立他們在學術上的風格而惋惜和憂慮。我們得老老實實作學術研究才有前途，抄襲和騙個學位的作風，我們應該儘快把它丟進垃圾桶裏才對。抄襲日人著作，改譯、改編日人著作等並不是作真正學術工作人士應該採用的正途。別再企圖瞞住台灣人後生，以為他們不諳日語，不通日文資料而來嚇唬。我們可以預料到，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後生會站出來，大大地給「你」來個痛擊。

對不起，話亦離了一點譜了。我們再回頭談正題。我們的研究會，有種種行業的研究家，有醫生、有小學教員、有商人、有文學家、有搞物理的、有出版社的編輯，但大多部份是在研究所、大專、高等學校服務的老師與研究員。

「霧社事件」的研究

因為同仁行業的多元，我們常常選出同仁能保持持久關心的共同研究題目。第一個是霧社事件，第二個是後藤新平。第一個題目我們花了十年，收集了不少日方的機密資料，包括一些不曾公佈過的殘酷照片。我們等一下再用幻燈機把它放大並加以說明。

這一部「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很是大部頭，加上照片，資料的排版花了甚多精力和成



霧社抗日起義前些時候的達茲其斯·諾敏(左)，達茲其斯·納偉(右)，達茲其斯·諾敏夫<歐敏·納偉>(右)，達茲其斯·納偉夫人<歐敏·達打奧>(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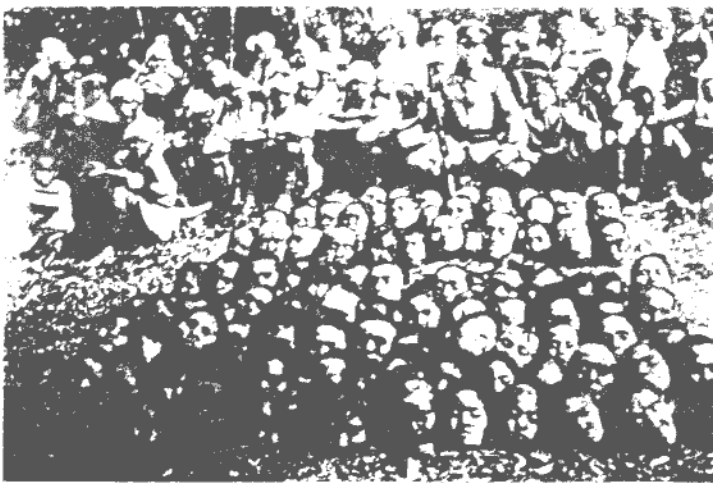
日本當局以此文稱為達茲其斯·諾敏(日名花岡一郎)和達茲其斯·納偉(日名花岡二郎)的絕筆遺書(我們台灣人士多認為此為偽作)，圖內小照為台中師範學校時代的達茲其斯·納偉。

本因而定價很貴。是日圓一萬三千圓，折美金等於五十多塊。出版社早期認為難銷，只印了一千部，沒有想到銷得很好，據東京來信說，最近能出第二版。

出了這一本書，我曾經雖然受了日本右翼、國粹激進派的恐嚇，但我還得提一提，日本人裏頭畢竟仍有他們的良知的。不然的話，這一本書不可能售完了第一版。他們看了這一本書當然會很難過，不過我相信，我們這本書對日本人是一部「苦書」，藉「良藥苦口」來比喻的話，屬於他們的「苦書」當能成為日本朋友的「良藥」，也就是正面的歷史教訓才對。

鄉弟亦希望這一本書能譯出來，同樣地變成我們自己的歷史教訓，我們同胞間的「苦書」。

下：由日本當局為報復，鬼計搞出第二次霧社事件，把起義高山族的遺族謀殺，其悲慘的人頭達到101。



27 民主台灣 31期 1983年9月

我在此還得特別表明，我沒有意思揭發日本朋友的瘡疤，我始終是保持「可忍不可忘」的態度來對待中、日兩民族間在近代史所扮演的一切「悲劇」。鄉弟認為揭發瘡疤一類的行徑是屬於情緒層面的，是屬於低層次的。那一種作法不但不易說服對方，同時亦不易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精神糧食」。

但很可嘆的是，我們同胞間很多人把批評與漫罵混在一起，始終沒有能夠把學術上的互相論評，互磋互勉，接受批評以提高研究水平的一種學風樹立起來。這一點，我們同仁以後還得加緊努力。

第二個共同研究題目為後藤新平研究，我們同仁雖然已陸續有過他們個別論文的發表，但我們還沒有編成一書。這個得等我明春返日後再重新籌畫。

我們同仁除了對共同研究題目下功夫外，個個同仁，各有各的研究題目。其中已印成書的算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刊行)為第一冊。若林君為了寫這一本書訪台多次，目前他是東京大學的「助手」(等於美國的 Assistant Professor)，我來美後，不久他到大陸廈門大學去作半年的台灣學術研究。

明年以後，我們的同仁將陸續公刊他們的有關台灣文、史類的著作。敬請諸位拭目以待。

來美後的感觸——後藤新平風波

時間已不早了，我們繼續來談我的第三個綱目，也就是「來美以後的感觸」。

最先，我們可以藉高伊哥先生所著的「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為引子。

高文我已詳讀了，這一篇論文據內容來言，沒有甚麼突破亦沒有甚麼新鮮的資料被引，我猜高君可能連後藤的女婿鶴見祐輔所主編的「後藤新平」傳都沒有詳讀過。

高文一出，台灣內部的黨外雜誌顯然吹起一陣一陣的「狂風」與「反狂風」。據我看問題有兩個：一個是高文的 subtitle（副標題）標了「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引起了爭議。「現代化」在此文並不等於中性詞彙，顯然這個詞彙是有正面被附的價值的。下面還來一下奠基者，這個就不是個味道了。不但有失民族的尊嚴，同時亦有失被殖民統治大眾的立場。因而引起眾人的批評。

很多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識份子，因在台灣戰後史，遭遇到太多的挫折及傷痕，必然地生起了憎恨以及不滿現狀，反對體制的強烈願望。

第二個問題該是「被殖民心態」病入膏肓，並不只是屬於高君一人，很多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識份子，因在台灣戰後史遭遇到太多的挫折及傷痕，必然地生起了憎恨以及不滿現狀，反對體制的強烈願望。但這些一直停滯於情緒化的層次，不易被提高到理性的層次來處理。這種心態的繼續反映了我們台灣內部社會科學的落伍，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我們聽說坐過將近十年的政治牢的人士也犯有同樣錯誤，沒有來得及克服與楊棄那種「被殖民心態」，我們感有無限的悲哀和說不盡的內疚。

高文叫我痛心，但是來美以後的所見所聞並不全是叫我失望的。不少的年輕朋友，搞台灣史的不管他們的省籍和國籍，甚至於不分人種，不分民族來找我談，與我交換意見。他們不單單正在克服老一代台籍台灣史家的「框架」途徑中奮鬥外，他們的熱情很感人。有一批年輕朋友排除了「美元」的誘引力，繼續爲了他們的理想而在掙扎，叫我感動不已。

高山青年覺醒叫我興奮

最近我在「環流」第十二期看到「高山青年的覺醒」的短文報導，這個報導也是叫我興奮的一件事情。鄉弟雖然還未能看到他們的刊物「高山寺」

我們非高山籍人士不能夠代替高山籍朋友來敘述他們的真正歷史。

，但我總覺得這種刊物的出現，不管它的背景如何，我認爲是一個突破。

我很早就提出，我們客家人和福佬人雙手並不是頂乾淨的，尤其是參與開拓台灣的客家父祖輩扮演過侵占山地的先鋒隊。我始終保有一種「原罪」感。

我在「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的序文裏早有提過，我們非高山籍人士不能夠代替高山籍朋友（我把他們稱謂 Native Taiwanese，或先住台灣人）來敘述他們的真正歷史。我們只能夠暫時扮演代爲收集和整理資料的角色，甚至於我表明了我們同仁因爲同是屬於迫害、欺凌高山籍人士的後裔，所以必然俱有不少的局限性。希望最近的將來能看到高山籍青年學人來承接我們少少的禮物，然後完成他們自己的歷史書。

我的預料好像就要呈現於我們眼前了，這個怎麼不叫我興奮！

當我們的書上市不久，我們同仁設法給高永清先生（很不幸，他去年謝了世。他是霧社事件倖免於殺禍的一位少年，他後來成了醫生，當了霧社鄰近高山部族的領導人之一）帶去這本書。我與高先生從未謀過面，但我有很多的同人和朋友去訪問過他。他寫了一封非常長而且感人的謝信給我，是用日文寫的。適當的時期我會公佈出來請大家作爲參考。

「龍的傳人」進入大陸事件

高伊哥的一文開了「狂風」，但侯德健的進入

(我並不很喜歡安易地把「回歸」一詞套上)大陸：好像也給我們帶來了一陣不少的風風雨雨。

我認為「龍的傳人」的歌詞寫得不錯。但我始終不能了解一些黨外人士最近的言論。他們喜歡提出一千八百萬的全體台灣人云云的話。我認為他們的提法雖然比起「台獨」第一代等人士常把省籍矛盾無限擴大成「民族」矛盾那一類的言論有些進步，但我覺得一千八百萬人云云的提法既沒有「內容」，亦是含糊不清的。至於有強逼一些大陸籍人士，或大陸籍人士的後裔認同台灣為至上課題，這一種「強姦」民意的作法是少有效果而應該不是我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至上人士來肯定的行為。

最近黨外論壇內部，有意無意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台灣意識」或有意地強調「台灣意識」的成長和成熟。

我認為他們有一點焦急，有意迴避客觀現實，輕視歷史過程，而一心一意，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的「理念」、主觀願望道出來。這個有一點像東條英機提倡人和魂，高揚日本精神的作法。

中共在大躍進所搞的一套也是為我們借鑑的。他們的領導層當年想調動「主觀的能動性」來作他們一廂情願的大躍進行徑。結果吃了虧的不外是九億八千萬的老百姓。沒有具體的基礎和條件，只靠空喊口號以及自欺欺人的「土法鍊鋼」是鍊不出真鋼的。

「龍的傳人」為何能在台灣校園歌曲中保持它的長期地位，還不值得高唱「台灣意識」成長論者探討的嗎？一千八百萬「台灣人」應該包含有多元的存在，我們只要不是裝糊塗，缺乏社會科學的學養的話，我們是不作這一種提法的。不過我還是同情那些正在玩「政治魔術」的黨外民意代表，不得不作出那一種呼籲的處境。但是，這一種同情是屬於「情絲」一類的，不是一種社會科學的洞察。

我們先前提到的高伊哥先生的論文，很可能是

我認為他們(台灣意識論者)有一點焦急，有意迴避客觀現實，輕視歷史過程，而一心一意，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的「理念」、主觀願望道出來。

借題發揮的。或許高君為了呼應「台灣意識」的成熟論，他不得不肯定後藤新平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他和他的同路人有必要肯定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台灣過程裏頭，不管它的動機如何，不管它的過程是如何的毒辣、殘酷，不管它只是被迫「遺留」下來它的「奶牛、寶島台灣」，不管這一隻「奶牛、寶島台灣」是我們台灣自己島民付出了莫大血汗才養成的，高君和他的同路人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掛帥」非來歪曲歷史不可。這個是值得我們痛心惋惜的。

台灣史的定位

最後我得提出有關台灣史的定位問題。我們台籍人士，尤其是受過日本教育的，易受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的影響。

我們因為生長於台、澎兩島，先天地有被染上「島氣」的可能。加上日本人的島氣，我們很可能負荷雙重「島氣」的包袱。我們四十歲以上，直接或間接地受過日本教育影響的朋友們，常常透過「日文」、透過「日本式思考」來看問題，來看世界，這一點是需要我們一再反省、自我檢討的。

很多同鄉不滿現狀，常常自閉守關地不願把自己的、台灣的「位置」擺在世界地圖，亞洲地壇，全中國的地圖來瞄一瞄，來思考思考我們自己所站有的地位(當然包括歷史地位)。人總是懶惰的，包括鄉弟是如此。但我們得抖擻振作一番，好好把我們台灣史的定位搞好才對。

台灣史當然需要從內部來探討，包括高山各族的歷史，漢族和高山各族間的鬥爭，爭生存的歷史，漢族間的械鬥的歷史等等。但我們為了明察「台灣何去何從」的課題，我們還得從全中國史，從亞洲史，從世界史的連綿上而作好台灣史的定位來考察問題，才不至於陷入自己的小「框框」，溺死於「小浴池」裏頭。我們不願面臨緊急關頭時空喊「救命呀！來人呀！」一類的哭調話。

我希望我們鄉親們，不管他的省籍，只要對台灣海峽的安靜，台灣和大陸雙方老百姓們的福利和人權的進步有關懷的，我們一齊來互勉互勵，多謝各位。謝謝！

台灣的

官僚壟斷資本

柳白先生精彩的演講全文，刊於「台灣思潮」第七期（已出）及第八期（將出），本文僅是重點概述

——編者

最近看到島內的雜誌上稱王永慶為第一號資本家。假若王永慶是台灣第一號大資本家，那麼國民黨就是台灣的特號資本家。國民黨在台灣的官僚壟斷資本是它統治台灣的經濟基礎。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黨自日本人（政府與私人）手中接收了當時所有的大企業。這是國民黨的官僚壟斷資本在台灣最早的起源。五十年代期間，國民黨一方面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擴充官僚壟斷資本，另一方面它接受了大批美援，在1950年到1965年間，美國經援部份總計14.6億美元。這筆資金除了用來補政府赤字支出外，絕大部份却投資到所謂公營企業中，用來擴充官僚壟斷資本。

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發展了「加工出口」的經濟型態。在這一階段內為了要發展加工業，必須要發展民間資本。國民黨這時曾幾次表示要將一些官僚企業轉為民營。在「十九點財經改革計劃」中曾經很清楚的說明公營企業如何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並將部份公營企業轉交民營。

事實上，國民黨不但沒有照它所公佈的去做，反而在七十年代初加速的擴張了官僚壟斷資本，像1973年開始的「十大建設」中用作交通方面的公共投資（公路、鐵路、海港、機場等）僅有1,000億新台幣，佔總支出的30%，而用在鋼鐵廠（中鋼），造船廠（中船），石油化工業（中油）和核

能發電廠（台電）的官僚企業投資則佔了2,200億新台幣，佔總開支的70%左右。在此之後，「十大建設」中官僚壟斷資本又再一次擴張。除此之外，國民黨更用國庫作担保向國外政府與銀行借貸。國民黨用來自國外的資金發展官僚企業在七十年代尾和八十年代初加速的增長。還有最近幾年來官僚資本與外資合作重組新公司也在增加中，像最近成立的大汽車廠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而已。

國民黨今日在台灣在生產方面壟斷了所有重大工業，像中鋼、中船、台機、台鋁、台碱等，完全獨佔一些與農業有關的工業像台糖、台肥。也獨佔和一般人民消費有關的菸與酒的生產。在交通方面官僚壟斷了海、陸、空各種運輸工具，並壟斷了電信與郵政。在金融方面，它壟斷了絕大部份的金融資本，包括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在商業方面，國民黨用中央信託局、物資局、國貿局等機構控制了很大一部份商品的流通。這就是在台灣的官僚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是國民黨今日統治台灣的經濟基礎。

（對官僚壟斷資本較詳細的分析，請見「台灣思潮」第七期和即將出版的第八期中的一篇鍾望如所著——“官僚壟斷資本，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經濟基礎”。）

中國對台政策 及 台灣人民的反應

李哲夫先生，台灣嘉義市人。1963年畢業於台大農業工程系。李先生雖就讀工程，却自小對社會科學有興趣。大學期間，閱讀自由中國，人間世等刊物，接觸自由思想，愈發關心台灣社會。但他同時深感社會問題不能光憑口號解決，應去了解社會科學。故於出國留學時，毅然轉念社會學。

1965年入 OKLAHOMA STATE U. 社會系，1967年得碩士學位。又入 U. OF N. CAROLINA 攻讀社會學博士，1971年得學位。

李先生的主攻範圍為人口，青少年及種族問題。1973年曾往新加坡、泰國研究種族問題，1975年被聯合國聘為人口學資深顧問，前往伊朗協助設立人口與經濟發展計劃，工作一年。1980及1981兩度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天津南開大學之邀，前往講學、研究。

李先生一貫關心台灣，支援台灣民主運動。他贊助郭雨新先生海外同盟及其他海外台灣人社團，為台灣的民主前途努力。兩次訪問中國期間，他也曾廣泛與中國領導人交換台灣問題。

—— 編者識

李哲夫：

「目前中國對台政策可以說正在形成期，台灣人民反應也還在混亂期，意見分歧，並無定論。中國對台政策還是很籠統，不具體。最近北大一教授在美華府演講「中國與美蘇之關係」，他說中美關係障礙最大是台灣問題。事實上中美建交時明確提到台海兩岸的事由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但兩岸的中國人似乎在忙着對美國說話，而不是認真地彼此

對話，我問這位學者中國對台海兩岸的對話做了些什麼？他除了重覆葉統帥的「九項原則」外，並未提到任何具體的事情，連九項原則的分析都沒有。另一方面在很多場合中，台灣朋友埋怨說中共儘是注意國民黨當局而忽略人民。但是當他們提意見時除了統一，獨立此兩極端的意見有正面口氣提出「要」之外，其他一系列的主張都是「不要」，不要國共勾結出賣台灣人民，不要共產主義，不要台灣

經濟生活受損等。真正要什麼，倒不知道，基本上是被動抗議性的，而不是主動提出為達成將來目標把握自己的命運的要求。

致於中國當局對台政策保持在籠統的狀況下，可能會產生下面不良的副作用：1 這問題不拿到正面做研究，中共幹部人員，照背九條，反來覆去「寄一個希望」，「寄二個希望」造成教條化。2 另外還會造成錯誤的路線。只求方便容易見效的溝通，展開對外關係除給自己滿足外，又可以做給國際上看，當然這在謀略上有它的作用。但是此後果會給人民產生反感，認為其目標不在於台灣基層人民，對象好像是富有的有社會地位的，大而明顯的。所有共產主義過去以工農人民為主的目標都忘記了。目前有一點點值得可取的地方是中共對台政策研究有關人員，承認他們需要更多的資料才能說可靠有用的話。既然有此一門打開，台灣人民如何表達人民的意願則更有關鍵性。

我們在討論台灣人民的意願時要放棄只是保持「否決權」的姿態，要拿正面的東西來開始討論。在談到人民的意願時，我有幾點想提的是：

- 1 不管是誰的功勞，台灣的民生自由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提昇。
- 2 我曾提起把「統一」換個名稱，改為「建立新關係」。建立新關係是建設性的，我們的眼光要放在將來而不是放在過去。因為台灣將來不可能是孤島而和世界沒有關係，若和世界不能隔絕則不能不面對海峽對岸的十億人口，將來如何和十億人口建立關係是不能忽略的。
- 3 目前有一種宣傳，也是在台灣特殊氣氛下造成的一個觀念，台灣人民生活比大陸好，大陸這麼窮，我們為什麼要和他們混在一起。這觀念又是被動的。以知識份子的觀點說，我們留學的目的是

（以下是大家的討論）

甲：我想提一下和你說的有相關的另外一點，如何使在台灣和海外的中國人先對自己的地位有認識，代表誰？站在什麼地方？將來如何？把對內的封閉改成對外能開放，必需對自己有信心，自己代表的東西有沒有將來。在台灣地方生存的人民和中國人民有一定的關係，代表的是人民的話，你為什

什麼，動機是什麼，其一是幫助落後地區的進步。我當初學社會學很強的動機就是想將來到第三世界的社會服務，所以我曾跑到東南亞，中東做過事。也就是說，既使把「國家民族」這類口號拋棄了，你還有一事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十億人口是屬於第三世界，是年輕人應該去貢獻的，單以實務的眼光來看，大陸上十億人民的將來是不能被忽略的。

- 4 年輕人應該善用歷史，歷史可以當借鏡，但不可以當包袱。我個人看法，今天在台灣問題的爭論及「死結」有很多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包袱。單單解決歷史問題並不代表事情的全部。展望將來必需考慮國家政治、社會、經濟的新秩序，例如，美國社會現在也在討論經濟新秩序，他們覺得過去太孤獨，過去外交哲學太關閉，雖然和國際有貿易，但都自我中心，沒有把自己納入新的經濟秩序裡，所以今天才產生汽車工業的不景氣，其他以量件生產的工業也沒有日本或東南亞的效率高，這些產生資本的基本技術若不再提昇就不行了。另外美國大公司至今仍對自己同胞玩紙面遊戲。新的看法主張公司不只是生產和賺錢，對人才資源的再生更新也應是他們的責任。我們不能以美國或其他地方現行制度為模型，對於將來的觀點是什麼，要有一個腹案，並且考慮如何使它成為可行。
- 5 在參與溝通上目前仍有困擾的問題。大家討論時都很有意見，但實際上採取有效的行動，與有關方面交流對話還有困難。其中有一個心理上的劣勢，尤其台籍人士不願有錦上添花的感覺，不願靠攏別人或沾光。好像與大陸接觸交往，就已經是一種「靠攏」。這些自我微小的心態都是阻擋自己去找正當的理由來參予溝通。

麼不敢向全世界去看去叫，而只有人民是有將來的，政權隨時會成為過去。要什麼？若不是要求做政客，當什麼官，若站在人民利益，地方利益，面對十億人沒有什麼不可講的，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問題是誰，代表的是什麼，看的多遠。

李：你的正義感我完全同意。今天海峽兩岸兩

個政權都給予人們禁忌，尤其台灣政權更是禁忌人們談海峽兩岸的關係。很多在台灣自我微小的心態下，大家彼此手拉手不敢向前多邁一步，誰邁一步就被懷疑，這種情況對我們不利，雖然我贊成你說的會有小政客出現，作投機的事，但若因此而對自己不信任的話會產生負效果。

甲：人民和政權爭東西是天經地義的，所有東西都是爭來的。

李：說意見，若老張去一個，老李去一個，各說各的，一點作用都沒，意見必須經過相當的組織而發表出來的才有力量，這基本上就是政治，言論須有群眾做後盾。

乙：中共既未能尊重大陸人民意願，又如何尊重八十年未統治的台灣的人民意願？西藏是一個例子。

李：我同情你的說法，但又不能完全贊成你的說法。你的說法又回到保持被動態度，不要悲觀，只有正面採取方法。台海問題要解決須自己民主的成熟，人民若不談民主及自己的意願等於是自己放棄。

甲：我有一個例子。若我是在台灣，發表一種說法，贊成向美國買武器，讓中共不敢來。另一種說法，歡迎你中共來，一千八百萬人搞民主，你敢不敢來亂幹。那一種說法有力量是顯而易見的。

李：歷史是可做借鏡，談將來的問題時，可拿西藏例子做參考，但不能拿西藏例子為不和中共談的理由，台灣人民需突破，不能放棄自己建立民主及推進民主的機會。討論台灣問題非國民黨專利，而海外人民談這問題亦有利於開討論之端。

乙：中共為什麼找國民黨談，而不找台灣人民談？是台灣人民不找他談，還是和國民黨談有更方便得到他要的東西？

丙：實際上，台灣人民現還未有代表，雖然有些個人自封代表台灣人民，但人家看不起，因國民黨有力量，所以中共找國民黨談。

丁：現在討論問題者多是中上階級。沉默的工農大眾誰來代表？誰來整理？若北京向台灣的勞動階級新生代談，在島內可能有些什麼反應？

李：沉默工農大眾的行動和知識份子有關，知識份子推動力。中共現還未大量討論此問題。為了統戰，他們忘了當初社會主義的堅持，從前為工人和農人的雄氣那裡去了！今天面對台灣問題他們

思想上還是覺得美國這一個強大的霸權在阻擋，把這霸權除去，他們以為台灣的問題他們自會解決。

戊：我覺得和政權打交道需有實力。

李：實力是重要的，但是實力的定義是什麼？對台灣問題的將來，有所主張根本上是進行人民的利益，民主運動要繼續推進，推進就是實力。

己：中台雙方立場限於他們的想法，我不覺得是資料不夠，我對改變他們想法不抱希望。

李：這仍顯示他們資料不夠，研究不夠以至有局限的想法。我對老一輩的人不樂觀，他們生活在過去裡，總是提起過去革命光榮的一面，對於前景不為年輕人想。但我們現在不講，不對中青年的人講，等到老一輩把他們的想法傳給後代就太遲了，但我們也不能和老一輩的不保持來往，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傳統。

庚：我感到這次聚會很難得，有從各地來的，有不同意見的，有各省籍的，我想談的是溝通問題，海峽兩岸幾千萬骨肉離散，現在了解和促進溝通為第一要務。海外華人除了帶出一些惡習外還加上了美國的個人主義，省籍的排斥，地域觀念，因此溝通很困難。黨外人士出國被包圍，不能和大多數的人溝通。美國社會的開放，包容不同意見，這些我們不但沒學到，比在島內還糟糕。海外許多人以台灣人民自居，而其看法和在台灣的台灣人民相去甚遠，而大陸對台灣人民之充分不了解也可從他們的刊物「台聲」看出來。另外台灣問題的嚴重性，我想國民黨是造成裂痕的最大原因。龍的傳人「前進」出來一篇文章有把十億人民和一千八百萬人民對立起來，這觀點就是錯誤，是受長期不能溝通和國民黨教育下出來的。今天從二二八事件到林家血案，陳文成案，一連串事件造成台灣人民很深的裂痕，這裂痕要我們不僅是一千八百萬人，可以說十億人，全體人來負擔這歷史上的傷痕，這是非常沉痛的。海峽兩岸不能溝通最大的罪過是國民黨，國民黨對外以中華民族問題來說是民族罪人，對台灣內部來說是民主罪人。最後我們也要怪美國官方的政策，例如女子壘球的事。如大陸除去打一打，仇恨情緒會減低點，這是好事，結果美國派波特支使國民黨掛國旗等而破壞此事。美帝對外一個賣軍火，一個搞分裂，不僅在台灣還在全世界搞分裂活動，今天國民黨就是搞台獨。

辛：溝通怎樣做很重要，台灣民主運動有點成

績的話，辦雜誌是有所貢獻的。各位談原則性外，要談些實際的東西。

丁：李教授提到採取主動，採取攻勢。台灣鄉親精神上支持黨外，希望更好，但他們和國民黨共同的起點是恐共，是失敗主義，怕和對岸九億六千萬人（四千萬人不跟他談）打交道。過去台獨是要把外省人趕出，現在的台獨是聯合國民黨及所有一千八百萬人一起來。我們不能站在失敗主義上，我們要出聲，如何在海外及黨外雜誌提倡清楚的新觀念及突破以帶動年輕人的心理觀點。

李：在放棄失敗主義，在向前走一步之前，我們要有相當的反省。海外反省之一是辦雜誌，國民黨出錢辦的雜誌，現在大陸版愈刊愈大，而民主運動的雜誌內容愈來愈「台灣化」難道當我們坐下來只能用親情來感動別人而不能用理性嗎？我不否認寫台灣歷史的重要性，但不是我們唯一要做的，我們要擴大。中共當局竟然也會決定設“台灣同胞聯誼會”，欲降政治問題降為鄉親路線。黨外失敗主義演變成據說黨外人士出國對美說「如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就是台灣人民起來公開反抗的一天」，難道黨外今天沒有足夠的理由來反抗國民黨，而要等到那一天才反抗。

庚：不能把黨外人士英雄化，助其奮鬥是對的，但不能捧，批評是需要的。

甲：另建議在島內談台灣非軍事化的問題，這問題非談不可。我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在安全問題上台灣人民為生存長遠利益有權要求不做黎巴嫩，不做貝魯特，不做強權的戰場，而國民黨阻止這些要求，今天我們要發動談這問題。不能把自己荒謬的說自己的軍事地位重要（重要也是一己之詞），就偏偏因為說重要而倒了霉，重要而不能自衛，人民就成了犧牲品。今天台灣還向美國買武器，再多的武器也是幫不了台灣防禦中共。軍火買賣肥了誰？台灣問題本是人民爭取利益的政治東西，現都被軍事、鄉情等蓋掉，其實國民黨有一個講不出口的真正目的是用軍隊來欺負台灣人民。

辛：百分之百贊成廢除軍事化。蘇秋鎮質詢過有關軍事國防預算佔總預算百分之四十五，這是破記錄的，台灣為全世界軍事密度最高的國家。其實中共只要封鎖台灣海峽而不用武力，台灣就保不住。國防非一定要靠軍隊，外交強也非常重要。台灣

及大陸的分立沒有民族仇恨，不應加深敵對，台灣沒有必要用這麼大的武器。雖然國民黨絕對不會放棄軍備，但推動非軍事化的理想是要有的，有了理想才能推進。

庚：台灣每年花三十多億買武器，很多沒有用，久了成廢鐵，對老百姓來說沒好處，說就是做的一種，有可能做不到，但誰知道。

丑：對台灣問題覺得政治性比軍事性強，希望大家提出可能做的別的事情，別的具體想法也討論。

李：我們不可忽視具體能行的事，說即是做，但需注意如何說，有組織地說，在公開場合例如選舉時將這種意見放入政見來談，即使有人因此成為政治犯，我們要做一點補救。促使人民的回鄉互訪，（不需只靠戲劇化的「投奔」）做更具體的幫助。有系統的提出具體新資料，說明各主義，制度，要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有所認識。台灣問題離不開中美關係，雜誌除中文外，英文也要寫，向國會及圖書館送。前次參觀北京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裡面圖書少得可憐，我們應把資料送過去。中文影響中國，英文影響美國。

寅：海外華人之間的溝通方面也是需要做的，海外還是台獨的力量比其他政治力量大，雖然真正台獨的人不多，但群眾很多，例如台灣同鄉會。台灣同鄉會裡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也有他們的政治理想，但受台獨影響，被台灣同鄉的感情束縛住了，如何將他們的態度轉變過來，向大處着眼而使海外聚成一股力量。但同鄉會的排斥性很大，也排外省人，是個大問題。

李：我曾反省這方面的事，但反省之後有一種無力感。但堅持那種狹窄觀念的成份，都在老化，這種死結是會過去的，不必正面頭破血流去碰。

丙：海外台獨力量雖然比其他的大，但他們的層面小，只止於政治層面，而非社會層面（如女工，大陸來台老兵，小公務員等），討論的是國會，立法，而非老百姓的切身問題。一些台獨及黨外人士的家世背景為中上等，許多尚為首富之家，這種出身限制了他們關懷的廣度。該應用海外同鄉會的政治水準，擴大到社會層面，加入社會主義，此社會主義和中共是有差別的。

（以下錄音不清楚）

黨外只需操心

—— 評 鄧維楨 與 李敖

被頌揚為人權王國的英國、它今天的人權狀態是怎麼得來的？在波共嚴密控制下，團結工會如何奇蹟般地產生？這兩個國家人民鬭爭，有很多地方值得當今黨外運動的參考。

在高雄事件震盪之後，在選舉的局限已逐漸呈露出來時，在台灣各種重大問題日見尖銳，民主運動已被賦予更廣大，更具歷史意義的使命時，作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者——黨外，它將何去何從，已成為逼人而來的重大課題。

透過百花齊放的黨外刊物與叢書，這些方向性的重大課題已逐漸登台。這是令人高興的發展。但，正如剛學走路的孩子一般，新生的事物在穩平邁步之前，免不了踉蹌跌步。這需要更多人來共同討論，質疑，並鼓勵其繼續邁步。本文便是一例。

台灣的民主運動無疑地將具有歷史意義。面對這個歷史性的方向探索，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是必需引來借鑑。

本文作者正是從這遼闊的角度來探視台灣的人權問題，是一篇不可多見的力作。

我們希望海外朋友們積極地參與這類方向性的討論。身在海外，接觸各種思潮較容易，這是我們可以貢獻給島內的特點。盼共同努力。

——編者識

人權嗎？

◁ 林中平 ▷

的人權觀

(一) 人權之外

大約在去年年底，「政治家」的鄧維楨先生寫了一篇「除了人權，黨外沒有什麼可操心的」文章，他開頭就說：「台灣的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爲什麼都有問題？主要的就是人權有問題。人權問題不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因此，可以這樣說，除了人權，黨外沒有什麼可操心的。」這個大膽的論斷，鄧維楨在那文中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來支持，頂多只是邊緣性的提到如果黨外注意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會把「注意力分散」而放鬆了關鍵的目標這一點點理由。但是這個理由不是什麼理由，如果黨外只有那麼一點點可憐的注意力，爲什麼要集中放在「人權」問題上去呢？鄧維楨對之也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他假設大家都同意他的推論，然後他在文章的剩餘部份提出一些如何注意人權的建設，如何提出「厚厚」的國民黨侵犯人權的清單，印「人權手冊」，在台灣各地成立人權接待站等等。鄧維楨的好朋友李敖也寫一篇「什麼是黨外最該做的事」爲他「黨外人士中最能冷靜思考，也最會冷靜思考的」朋友鼓吹（見李千秋評論十四）。不過李敖先生讀書畢竟是「淵博如海，心細如髮」，他那一篇鼓吹的短文小心地稍修改了鄧文的原意：鄧文的大膽論斷，主要是反對一些黨外人士「認爲黨外除了要關心人權之外，也要懂得治理國家大事，因此他們要求自己多注意國家的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等大問題」這種「又老實，又糊塗的想法」。但是李文將之修改成「黨外注意了太多的行政業務，而忽略了『關鍵的目標』。這種

黨外，會爲不參與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的行政業務而臉紅……顯然是捨本逐末了」（我的重點劃線）。李文把鄧文要批評的「大問題」變成小小的「行政業務」，這樣一來，他的理由就非常充分了，畢竟，弔唁王迎先子女比起弔唁高玉樹媽媽來是小事，爲人權苦心焦思是比「F十六好還是幻象式噴射機好」的問題來的重要。但是李文這樣一來顯然也就把鄧文原來的論斷大論化小論了。不過大體上來說，李文和鄧文仍是站在同一條線上的，畢竟，黨外人士都該以「陳平」自期許，都該以成爲「大政治家」自勵。畢竟，「做奴隸的人，只關心拿掉桎梏就夠了」，「政治家一旦掌握政權，全國人的智慧和全國人的資源都等著他運用」。但是，如果做奴隸的人不關心桎梏之外的大問題，一旦桎梏拿掉，他會治理國家，尊重異己，有能力維持真正的民主嗎？東西幾千年以來無數「拿掉桎梏」的革命史，除了他們高貴的情操我們該學習之外，許多慘痛的後果我們也該警惕，該去研究其中的原因。另外，「政治家一旦掌握政權，全國人的……都等著他運用」這種「優異份子主義」（ELITISM）的想法真是奇怪，好像全國人民只是一部機器而已，黨外一旦掌政時就像把國民黨這個老司機換掉就行了，「大政治家」駕駛這架「老機器」一定得心應手。鄧維楨說我們的新司機在駕駛之前只要注意點「數學與科學」就可以了，請鄧先生不要忘記，國民黨的官僚系統裏面學「數學與科學」而管一大堆其他事的人可真多啊！黨外人士的「科學知識」和「決策能力」要比起國民黨官僚系統裏面的知識

份子恐怕還差不少。套句李敦先生的名言，黨外人士再怎麼注意「數學與科學」或「決策能力」等等，說不定頂多在駕駛成績上「只能考到第三名」呢！

回到鄧維楨先生文章的論斷本身。這個論斷雖然大膽，但却其來有自，它可以說是台灣一部份自由主義者傳統的一個有力的總結。在年來台灣的黨外仍然受到很大的挫折與打擊的今天，在三十多年來（或八十多年來）台灣黨外歷史演變到現在而需進一步的加以反省與改革的今天，大家應該仔細反省思考這種論斷。人權問題當然是個有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但是在所謂的「卡特人權政府」倒台、世界上保守或新保守主義的興起、鐵娘子大勝英國工黨的今天，我們對「人權問題」的提法應該多具一點批判性。這是我寫此文的一點希望。

（二）正面人權與負面人權

人權的提法，大致上有兩種，一種是負面性的人權，一種是正面性的人權。負面性的人權大致上是以「我有不受……限制、干涉的權利」的形式出現，而正面性的人權大致上是以「我有要求……的權利」的形式出現。負面性的人權起始自英國光榮革命與洛克天賦人權的傳統，而正面性的人權始於小彌爾前後，而為第三世界，以及聯合國的許多第三世界的組織所大力提倡。

洛克提倡負面性人權，他心目中的主要對象，是過去圈地運動以來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所以他「政府第二論文」中一個主要論點如「人對土地注入勞動是他對那土地的權利的基礎」等，就是在於財產權的建立（是人權中最主要的一權）。他在「第二論文」中從中世紀的傳統道德權利觀開始演繹，到了「論財產」一章時他終於推論出「人有累積、擁有超過自己需要的金錢財富的權利，即使全世界的土地都被資本家佔光了也是一樣」。他認為「工人的權利並沒有被剝奪，因為工人以勞力換取他應得的工資。這種在生存邊緣的生活工資（只夠活在手與口之間的工資），據洛克說，還比在美利堅大陸上的印地安酋長的生活過的更富裕充足呢！（？）所以洛克負面性的人權論主要受益者及支持者是當時有商業頭腦、賣羊毛的自由派地主貴族以及在

城市及港口以金融、貿易致富的中產階級，它主要來對抗的是王權、保守派貴族以及不滿的工人、農

負面性的人權大致上是以「我有不受……限制、干涉的權利」的形式出現，而正面性的人權大致上是以「我有要求……的權利」的形式出現

人。

總之，負面性的人權的要點是為一些「有能力發展但却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阻礙」的人的立場辯護。但是對於一些當時只是以活在手與口之間的窮人，對於當時一些「無恒產」的人，他們每日奔波於手與口之間，是沒有什麼「能力」去享受那些負面性的權利的！而高揭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對那些「無恒財」的人恰似一種侮辱。因為他們出血出力打完了英國的內戰，推翻了王權，但是還是沒有享受到什麼「負面」性的權利（當然也絕對沒有參政權）。

正面性人權則是針對負面性的人權而設的。它的重點在於「雖然沒有能力發展，但却要求有具有這種能力的權利」。所以，不能享受到具有人的尊嚴的生活，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工資太低，工廠非人的待遇，沒有資金與技術來發展工業或做生意，買不起肥料來務農，穀價太賤傷農，農產品在世界上受到大國控制以致傷害到第三世界的出產國等等都可以調在正面性的人權的範圍之中。當然，這種「沒有能力」的人「貧而無厭」的正面人權是令「有能力」却處處防著他人來侵佔而高喊負面人權的人很討厭的。所以英、美（包括卡特政權）等第一世界的國家對聯合國第三世界的這種正面人權的提法很反感，但也無可奈何，反正他們現在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不援助第三世界就是了。但是這種正面性的人權論調也沒有什麼大的發展，畢竟光喊人權的力量是太薄弱了。

鄧維楨心目中的人權，很顯然的是「負面性」的人權。他對人民能夠「旅行地區」，能夠「自由的到世界各個地方旅行」，能夠「白天睡覺，深夜到街上逛街」，「成立釣魚俱樂部」，「組織石頭教與鴨蛋教」，「不可檢查電影內容和廣告」等等這些權利很感興趣。但是，要能夠到世界各地旅行，白天睡覺，夜裏逛街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啊！

鄧先生既然談負面人權，爲什麼不提最起碼而大部份人真有能力做到的負面人權，如自行組織工會、農會、漁會、學生會等讓大家能夠起碼組織起來互相照顧權益？（當然，在負面人權的祖國英國，在一八三二年改革法案之前也是不准組織工會的）。再說，如果真的黨外除了人權之外就沒有什麼可以操心了，那是不是只提負面人權就夠了呢？對此，提倡者（包括鄧維楨）並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來。反過來說，如果正面人權也該提，該促進，那麼怎麼能夠不直接牽涉到經濟、教育、軍事乃至於外交這些「大問題」呢？如果黨外談正面的人權如提高工資、核能發電危險等等問題，國民黨經濟的大官僚們幾句 NEOCLASSICAL, FRIEDMAN, SAMUELSON, HAYEK, 或費、蔣、俞或泰勒（！）等如何如何下來，黨外怎麼去應付他們呢？如

算國民黨的權力只算他們的血緣姻親關係的封建大家庭是非常不夠的，千萬不要忽略他們那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技術官僚系統，以及國內國外的各種利益連繫

果未來的「大政治家」們連這些都應付不來，或支吾了半天却無法不同意於他們，他們又怎能夠在除掉桎梏之後能治理國家，令人民覺得有了新形象呢？國民黨的技術官僚系統會反對你、攪你、搗你的蛋，你若沒什麼辦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大問題，他們會告訴你們「先穩定後發展」的老路才是正路（他們會提出三十年經濟發展與反共的「經驗」！）。這樣黨外的「大政治家」恐怕只有無爲而等著人家來治吧？算國民黨的權力只算他們的血緣姻親關係的封建大家庭是非常不夠的，千萬不要忽略他們那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技術官僚系統，以及國內國外的各種利益連繫。他們有點經驗，至少曉得一兩條路可以走，如果黨外無法以足夠的社會力、知識力與之對抗，即使以後當權了，學習過數學與科學且具有「決策力」的大政治家們可能對之是束手無策。這種現象是歷史上一切政治大變動之後的通例。等新上來的政黨窮於應付過去的官僚系統而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時，就是過去倒台的政權最好的利用機會，他們看你的好戲、搗蛋，新政權不服，然

後開始鎮壓等等。這些歷史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教訓呢？（註一）

（三） 權與權利

再進一步，讓我們來談談人權從那裏來的問題。一般所說人「權」的權，可以分爲權力與權利兩種不同的內容。任何社會都有一個權力（不是權利）的問題，用來支配社會的利益、生產的進行以及生存與秩序的維持。權力落實下來，就表現在經濟的運行，資源、消息的獲得、軍事與強制力量的分配與執行，以及知識的傳達、壟斷、歪曲、限制等等。最後還有社會與社會間彼此權力的交互運作。權力的運行與分配，就產生了「有些人甚麼都可以做，而有些人却許多事都不准做」等現象。把這個現象加一些道德味，便是「權利」。因此，「權利」是「權力」分配下的結果。近代民主觀念要求人人都有相同的權力，即「人生而平等」的「天賦人權」觀。但這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吧了。在現實社會中，權力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要得到平等的權力以及權利，要使個人享受到基本的「人權」，還得依賴人們自己去爭取，去改變社會的權力分配狀態與權力結構。孫逸仙先生晚年所提倡的「革命人權」說就是這個意思。孫先生這個學說畢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回到鄧文的大膽論斷：「台灣的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的什麼都有問題？主要的就是人權有問題。」這種說法就如說：「爲什麼美國鹽湖城那麼熱？四周黃沙遍地？少雨多熱風？主要原因就是鹽湖城裏溫度計上的指標太高了。」因爲「人權」只不過是社會權力分配的一個溫度計，「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等才是權力的實體。忽略問題的實體，却想解決指標，這種倒因爲果的論斷，就如只求鹽湖城溫度計指標下降，却不去探究氣象、環境

「人權」只不過是社會權力分配的一個溫度計，「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等才是權力的實體

問題一樣，其結果不僅「經濟、軍事……」等問題

解決不了，連人權問題也難有改進。

看看台灣實際的情形吧！爲什麼台灣當政者敢不顧世界民主潮流而高倡「東方式」或「韓國式」民主？因爲你對他無可奈何。面對著各種不合理、不平等以及壓迫的社會現象，台灣人民爲什麼不去反抗？（李敖曾指責台灣老百姓在國民黨「教育之下」愈來愈混蛋了，見李敖的千秋評論十一期）因爲各種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權力被國民黨全盤壟斷下，「混蛋」的老百姓根本不可能去維護自己的「人權」。

四 英國社會史的借鏡

以上批評鄧維楨與李敖的論斷，並不在全面否定他們的貢獻。相反地，他們兩位近幾年來對台灣民主運動的貢獻是吾人素所敬佩的。尤其李敖的文章，讀者很少不爲其悲憤、正氣、與犀利而感動。他在大方向方面，足以比美近代西方的一些「輝格」（WHIG，自由主義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少數不打著「自由主義」招牌的真自由主義分子。

在思想、教育嚴格控制下的台灣，自由主義是有良知、有求知慾的知識分子所能接觸到最先進的理論體系。在人們與統治者抗爭時，自由主義很自然地成了受迫者的聖經。因此，自由主義很容易地被美化了。

人權問題，正是自由主義者探求的要點。爲了更深入分析鄧、李的論斷，回顧一下自由主義「祖國」——英國追求人權的歷史，似乎是不無俾益的吧！

爲人謳歌的英國大憲章，其實是自私獨裁的貴族們抓著一個機會逼約翰王簽的。但只要權力平衡稍有變動，國王就立刻不認賬而掀起戰爭。十二世紀以後到光榮革命之前是貴族與王權來來往往爭鬥的時代，誰在當時覺得「大憲章」對他有利就高舉其幟，不利便根本不提它。到了一六四五年，英國的清教徒革命（許多人竟然說英國是漸近的，沒有革命！？）也是用軍事、經濟力量決定性地重創了英國王權的權力。當英國人砍下他們查理一世的頭時，法國人大概連想動王室一根毫毛的念頭都還沒產生呢！但是英國十八世紀末許多人却爲法國的後

輩砍下路易十六的頭而悲痛到呼天搶地（最精彩的是英國輝格中的一個寶貝——BURKE！），大概是「攻守之勢易也」的緣故吧（註二）。到了一六六〇年王室復辟，保守派（TORY）抬頭，詹姆士二世立刻又想伸張主權，一六八八年保守派地主貴族便再次的與輝格、清教徒聯合起來不惜以戰爭解決權力分配問題。但彼時王室已弱，詹姆士二世只好身無分文的逃到路易十四的帳下去了。所以光榮革命後，英國的權力大致上就分配到地主貴族階層的一層上。從一六八八年到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這一百五十年間，英國的權力分配只有偶爾更集中而沒有更開放。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那麼我們也就能了解英國這一百五十年間談「權利」的範圍與限制，什麼可談，什麼「權利」不可談。英國人當時能夠擁有的「權利」已經在權力分配之後決定了。英國工人及中產階級尚未擁有的「權利」，還得以「各式各樣」的方法去爭，高呼「人權」只是其中一小部份。

一七八九年以後英國便進入他們的「法西斯」時代。到了拿破崙戰爭前後這個狂潮達到巔峰，反對者所受到的打擊，台灣這幾年來的許多「事件」還不夠看呢！但是在那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真正風起雲湧的還是英國的工人運動（英國中產階級一部份也參加英國的JACOBINISM，但等到法國人砍他們國王的頭時，中產階級便撒手不幹。從此以後英國的中產階級運動便與工人運動分離，但在爭

在人們與統治者抗爭時，自由主義很自然地成了受迫者的聖經。因此，自由主義很容易地被美化了。

權力時有時也間接地與工人運動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

英國當時的工人運動是以技工（ARTISAN）爲主體去爭的，因爲工業革命牽涉到他們的經濟、技術的利益（註三），這使他們特別有充分的動機去參與運動，而不是受感召於洛克式的負面人權就動作起來了。當時英國的一些知識份子也積極地參與，幫助工人運動成長，最有名的如THOMAS PAINE, JOSEPH GERRALD, JOHN THELWALL，他們也談人權，但他們已經開始談正面的

人權了。以後的工人運動查德主義與LUDDISM等，也莫不是在「經濟問題」上與保守黨大爭特爭。保守黨後來乾脆在PETERLOO 大肆屠殺工人運動者。

這個權力下放的結果，又一次的使英國這「權利」的概念有了新的意義。但千萬不要忘記這些新的「權利」是怎麼以社會力做堅實的後盾爭來的啊！

另一方面，英國的中產階級對他們的經濟權益毫不放鬆，工業革命的結果使得他們有更大的「經濟勢力」，他們於是也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力，他們攻擊針對當時英國許多ROTTEN BOROUGH 及POCKET BOROUGH（即類似現在台灣許多各式各樣的萬年代表之類的）的醜惡法規。

請注意，中產階級的這種爭法也不是專攻「人權」問題而已，他們與輝格聯合起來，積過去的許多經驗，很有效的限制英國陸軍的權力。每次打完仗後他們便以他們的力量立刻促成陸軍縮小編制或解散。他們在地方上的勢力也很強，往往自己人就夠維持他們的利益，這使英國警察制度的介紹變成很晚近的事。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積他們工業革命的經驗，有效的對經濟、金融、外貿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有了掌握與知識（不像在今台灣，國民黨對經濟決策，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的技術官僚有著無上的權威性）。所以，英國的中產階級要求革命，要求政治參與權，不要忘了他們背後社會力量雄厚一至如此！

一八二〇年代英國經濟蕭條，工人農人的不滿與工人運動澎勃不已，使得英國的統治者遭受到下層社會無比的壓力。另外，中產階級與輝格的聯合也緊緊的卡住英國統治者的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等關鍵點之上。這兩股勢力各有其雄厚的社會力量作後盾，矛頭都指向同一個目標——英國的保守勢力。最後一八三〇年歐洲又鬧革命，更使英國的統治者覺得警鈴大響。終於英國在一八三二年通過以後傳為佳話的第一次「改革法案」，使英國的中產階級開始參與政權，這個權力下放的結果，又一次的使英國這「權利」的概念有了新的意義。但千萬不要忘記這些新的「權利」是怎麼以社會力做

堅實的後盾爭來的啊！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八三二年許多保守黨說什麼也不肯把權力下放，還傳說保守黨的威靈頓將軍將挾滑鐵盧的雄風前來鎮壓改革者。最後連威靈頓將軍的軍事力量都沒有把握對抗而告作罷。這種爭法才是真正的爭到底。威靈頓公爵為什麼要退縮？槍桿子為什麼不響？因為保守黨人們清楚，「軍事」二字嚇不了改革者。改革者也懂軍事權力運作的道理，曉得英國軍事權力的弱點所在，並在改革前與改革後都緊緊的釘住不放，改革法案才沒有成為廢紙一張。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是由許多半獨立的機構、團體、組織、階層來交互運作的結果，如果放鬆了任何一面，這些機構、階級就會起來反對你，「全國人的智慧和全國人的資源」不會等著「大政治家」去運用的。順便可以一提的是，第一次改革法案使權力下放到中產階級為止，工人要有投票權，還要再接再勵地奮鬥三十多年才得到，農人、婦女等排隊就排在更後面了。

如果我們反省一下這段英國的「革命人權史」，便更可以覺得鄧維楨的大膽論斷的倒果為因的荒謬性。英國人從封建社會開始爭權力，爭到「權力」的後果的「權利」就不是假的。他們是真正的在爭，是整個社會中每一個集團、機構、階級都動員起來用任何可以想像到的，有效的方法在爭。他們

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是由許多半獨立的機構、團體、組織、階層來交互運作的結果，如果放鬆了任何一面，這些機構、階級就會起來反對你

是老老实實但毫不糊塗的在爭權力（鄧文中說他們反對的意見「既老實，又糊塗」）。而且爭完之後也毫不放鬆他們爭來的權力，對之看的緊緊的。反過來「大政治家」這種優異份子主義的想法，就完全忽略掉社會上每一個集團都該發揮他們一份力量來做權力平衡的想法。近代中國有許多高喊入雲的革命，但是這些革命離「全民革命」的程度還是很遠。一些優異份子和槍桿子結合起來奪下了幾個大城池便算是革命成功了，然後「宣言」全國任何團體、工、農、商業都有自由組織及參政的權力等等。歷史上證明這些「宣言」大部份都是廢話，史家看到這種情形常會說宣告「宣言」的人沒有誠意。但是有誠意便能辦事嗎？為什麼不反過來看問題呢

？全國大多數的團體、工、農、商等等組織在革命前何曾真正覺悟起來「爭過」權力呢？一個人如果不以實力真正去爭，別人不會給他的，不管這「別人」是聖王，是奸雄還是小人。

最後要指出在中國的政治道德傳統裏面，教導老百姓視「權力」為邪物，動不動就喊「某些貪圖權力的野心份子如何如何，但是「權利」——「權力分配」的結果，大概是字不太同了，東方的「自由主義」者倒很喜歡談它。只是不要忘記，西方的輝格是對「權力」最敏感的動物。背誦一下他們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就可以曉得一二。但不要以為這句名言是對「權力」的唾棄，恰恰相反，這是為他們「權力平衡」的理論作根據的。

(五) 波蘭團結工會如何結合社會力量

英國自由黨人爭「人權」的歷史，說明「權力」是爭來的。「權力」爭到後，亦即社會裏權力的分配較合理，個人的「權利」才有保障。然而，台灣的政治控制那麼厲害，不要說工人運動了，連自由組織工會都不允許，又如何能夠開展類似輝格的爭權運動呢？

對這個問題，波蘭的團結工運應是值得借鏡的。在對人民的控制程度，波共是絕不在台灣國民黨之下的。然而波蘭却奇蹟般出現團結工運，有力地沖擊波共的統治。團結工運如何能發揮如此重大力量？這是每位關心台灣民主運動所應認真對待的。

和台灣八十年來一樣，波蘭也有一個反抗的傳統。但是在波共統治的前二十年，儘管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波茲南工人暴動，有國會中基督集體「ZNAK」的對抗，但都未成大氣候。工人在工人委員會裏，知識份子在俱樂部，社會各階層間，各集團間都沒什麼聯繫。

一九六八年劇作家DEJ MEK 作了「DZIADY」一劇寫沙皇時波蘭愛國者反沙失敗的慘痛事蹟——作者和觀眾都有一個相同的用心和詮釋，把歷史劇看成是衛星國化以後的現代劇。結果非常的成功。但是後來此劇不許在各地上演，不許上演一部揭發「被蘇聯老大哥革命掉命的沙皇」罪惡的故事！這立刻引起各地學生的抗議、佔領學校等機構。這

種浪漫式的反抗當然很快便被鎮壓。但這個反抗仍然覺醒了不少波蘭知識份子，「政治戲劇」開始大為流行。它改變了知識份子對藝術的觀點，現在著名的導演WAZADA 也是那個時候找出一條新的表達方式（小說家MILOSZ 也在那時發展，波共在那時稱他是「間諜」、「帝國主義的走狗同路」。在這種新文化塑造下的一部份波蘭新生代，將是以後與土人合作的KOR中的主要成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波蘭沿海工人又發生暴動，和一九五六年相似，工人要求參與工廠的決策過程（雖然導火線是肉價突然上漲）。但是波共從直昇機上向群眾開槍，從偽裝的救護車中擁出警察開槍救平了這一次的暴動。一九六八年與一九七〇年兩次慘痛經驗使波蘭人得到一個主要教訓：無論是知識份子、學生、工人或其他的團體都無法「單獨地」對抗波共而贏得政治勝利。一九七六年波蘭經濟又出大問題，肉價又得大漲，於是URSUS RADO M等大工業區的工人再行暴動。波共突然宣佈肉價不漲了，但是示威暴動者要受嚴厲的懲罰，波共尤其對RADOM的工人施行警察暴力。這種手段再一次地激起二十年來工人累積起的憤慨，使得工人這股社會力處在一個臨界狀態。但是波蘭工人還得等待知識份子的聯合。這就是一九七六年著名的工人防衛委員會（KOR）。

當時波蘭的那一群知識份子看到RADOM這種慘狀，便自動組織KOR（其中成員有律師、詩人、科學家、藝術家、教授、學生、演員、作家等）到RADOM去替受害的工人們辯護、宣傳、籌款、組織等等。由於KOR這種角色的成功，使KOR立刻擴大許多倍，也立下以後波蘭工人與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形成團結工會的基礎。以後在團結工會的形成以及與波共的對抗過程中，KOR中的律師、作家、學者不斷地為團結工會思考及提供對策。另一方面，KOR中的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還主動的挑戰波共許多社會與經濟的大問題。面臨波蘭的經濟困難，KOR中的知識份子提出一整套波蘭經濟所該執行的方向與政策來挑戰波共那種破爛的衛星國經濟。我們要知道，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四日GDANSK「坐廠罷工」（OCCUPATIONAL STRIKE）的第二天中午，波共便切斷了全國各大城市之間的通訊連絡網。但是全國性的團結工會仍然有

能力，後來在GDANSK 形成。這一再的顯示各階層間、各團體間的聯合是太重要了。這中間牽涉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以及各方面的知識集合起來應付情況。

（六）黨外的正路

李敖在千秋評論（十三）說：「黨外的正路、黨外的康莊大道無他，死心塌地的走西方民主路數而已矣。」黨外要民主，這是黨外存在的首要意義。但是，西方的「民主路數」到底是甚麼「路數」呢？如果只認為「人權問題」才是西方主要的路數，我看這種「東方看西方」、學一招半式的「民主路數」差西方真正的民主路數遠矣。

人權問題絕對需要重視。統治者侵犯人民的人權，正和統治者其他不民主的行為，以及社會上任何不正義、不合理的事情一樣，都是追求民主人士所必需重視、必需揭發、必需批判。但是，社會的現象十分複雜，社會上反民主、不合理的現象那麼多。釐清那些問題是主要的，那些問題是次要的，何者為主，何者為從，是非常重要的。不幸，這個釐清工作，在台灣很少進行；僅有的少數，也往往主次不分、倒因為果。以李敖之博知勤學，也不免有所差錯。這是筆者深以為憂的。

歐、美的民主，是當地人民幾百年爭取的結果。他們今天的民主果實，可懸為我們追求的標的，激勵我們努力的信心。但在欣賞別人果實的同時，不要忘了任何果實都必須經過耕耘、灌溉、施肥、除蟲的過程。自己不耕耘而想立刻享受果實之美，這是不切實際的。台灣如要解決人權問題、享受高度人權的果實，是必須下過一番爭取的苦工。要爭取這些，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了解與研究，都是必備的。

今天台灣黨外的意義，絕對不止於一些狹義的「政治發展」而已。台灣人權發生問題，只是一個更大問題水山的露頭，表示台灣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都有問題，表示台灣社會的權力分配有了根本問題。人們不滿於這些，因此來支持黨外，黨外身負改革的重任，必須要有創造更新社會的懷抱與見識，而不能只局限於「人權」的表相問題。

不可否認地，這是一個艱鉅的工作。黨外不僅要發展出更多見識廣博、研究深刻的人才，還必需調動各種社會力量，並力求與之結合，如波蘭那樣。近年來，台灣年輕學生新生代與律師界有一部份人加入黨外，文學界及新聞界也有些人十分支持黨外，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發展。但僅僅這幾方面還很不夠，特別是中下層的力量。台灣的工人數目多，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龐大潛力，但却未有效地發動。黨外知識份子該多向波蘭的KOR學習，主動與他們結合起來去解決台灣中下層社會的種種問題。如果整個社會的各部份、各團體、各階層的正面性力量都能夠「動起來」，這凝聚起的力量才夠大，改變社會的權力結構才有可能。

附註：

（註一）鄧維楨說：「……不懂經濟、不懂軍事、不懂教育、不懂外交，並不妨礙一個人成為大政治家。」這句話頂多只能半對。它較適用於現代歐美議會政治已很成熟的國家之中（即使如此，「四不懂」的大政治家大概仍是一個草包）。但這些國家政黨也有充分的知識份子人才，不但「四都懂」，還懂一大堆其他東西。但在台灣黨外或第三世界國家，鄧的話就大錯特錯。這些地方都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而且他們不是中性的，而是為現在統治者服務。這些官僚散佈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黨外人士對之如不研究對策，即使他被人民選上台了，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註二）英國人於一六四九年誅君，法國人於一七八九年誅君。法國人共和黨誅君也誅貴族，所以英國貴族不喜歡法國共和黨人。更糟的，英國在十八世紀末也有英國式的共和黨人，想學習法國的共和黨。所以當時英國統治階層對法國革命深為痛恨。當時英國「自由黨人」BURKE 深深譏諷於法國大革命的狂潮。他因詆諆英國國內的共和黨及工人運動者為「豬糞般的群眾（SWinish MULTITUDE）」而馳名一時。

（註三）「技工」團體是中世紀傳下來的技藝匠人們的團體。工業革命前後的新技術、威脅到傳統技工用以維生的技術。工業革命的「工廠化」威脅傳統技工生活於其中的「技工社團」。

事情的真相，往往比表現出來的現象要複雜而重要得多。本文所介紹的，便是一例。表面看來，美國外交由美國總統及他所選定的國務卿及國家安全會議等來主持。這些人都是向美國總統負責，間接地便是向美國選民負責，以此體現全“民”作“主”的“民主”。但事實上，美國外交另有一個太上國務院，不受選民的監督，而由一群極端有權有勢的人組成。這個太上國務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且其影響力不因誰當總統，或那個政黨而削弱。更重要的，這個組織及其運作方式是那麼地不顯眼，以致於如果你去問一個路人，十之八九不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他們的民主權力原來被這麼操縱的。

本文共分四部份。前兩部份分別登出理事會的簡史以及它的人事網，描述理事會如何形成，有過什麼「貢獻」，它跟美國政府及其他公、私重要機構的人事關係。本期則以一個具體的例子，說明理事會如何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理事會本身對世界形勢的基本看法。從這些，你還可以看到，理事會如何抓緊世界大戰的鉅變，規劃其稱霸世界的藍圖。在「為自由、正義而戰」的背後，掩蓋着這麼宏偉的圖謀！

下期將刊出結論與展望。

—— 編者按



帝國之腦

介紹美國「太上國務院」
外交關係理事會

“外交關係理事會”是一極具影響力的私人組織，有時被稱作“
真正國務院” —— 馬文及伯納·卡布

“外交關係理事會在半世紀以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有極重
大而具體的貢獻” —— 紐約時報

范棟 譯介

取材自：L. SHOUP & W. MENTER,
“IMPERIAL BRING CRUST”1977

(三) 理事會對美國外交的具體影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外交關係理事會一直都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以下我們介紹一些有關它的個案研究。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外交關係理事會的確是個「帝國之腦」，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都有它的影響存在。

外交關係理事會自成立以來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漸增長其影響力。特別是世界二次大戰的爆發使該會對美在國際爭霸的決策影響達到完全成熟階段。該會的戰爭與和平研究小組，在與美國政府的合作下，草擬出一個戰後以美國為支配勢力的新世界秩序的計劃。他們想建一個世界第一號強國——美國帝國——以便組織和控制地球上的廣大區域。在所謂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名目下他們規劃着如何重整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以便美國的支配。在規劃期間，羅斯福總統、國務院，和一些在政府當職的該會會員皆對該會予以協助和合作。

該會以為美國應擺脫孤立主義，參加戰爭。此立場主要基於其對美國應如何重整世界秩序以便爭取大英帝國、西半球、及亞洲地區的廣大原料和市場的考慮。本章將描述該理事會如何定義世界問題，美政府如何接受他們的帝國主義式的美景，和由此霸權藍圖所產生的戰後國際新局面。

戰爭與和平研究計劃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外交關係理事會立即考慮到需要就美國將於戰爭期間及戰

後和和平中可能遇到的種種難題做一事先有系統的研究規劃。為了避免美國重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無充份的準備而措手不及的錯誤，理事會的領導人們相信擬訂一個如何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的藍圖是必要的。不久在相互商討下，理事會和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達成共同研討美國未來長期利益的合作計劃。當時的國務卿 Cordell Hall 是該理事會總裁 Norman H. Davis 的好朋友，副國務卿 Sumner Welles 是該會的成員。他們同意定時派國務院代表和理事會的領導人們聚會。理事會於是設了五個戰爭和平專案研究小組。各組將研討的結果推薦給國務院和美總統參考，研討內容乃屬機密，不對外公開。此五個研究小組乃分別為「財經」、「政治」、「軍備」、「領土」和「和平目的」小組。在其上設有一中央指導委員會（Central Steering Committee）以便統籌和指導各小組的工作。該指導委員會的主席乃是 Norman H. Davis，羅斯福總統的 ambassador-at-large。研究小組們的共同目標是「繼續研究戰爭的發展，擬訂具體的建議以確保美國的利益」。

自1940年到1945年平均每研究小組有十到十五人。在此六年中共約有一百人參加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學術界人士、政府決策人員、財團的律師、報業代理人、銀行家和企業家。在1940年，該會的二個成員，前 New Hampshire 州長 Jone G. Winant 及退休了的海軍上 William H. Standley，分別成為美政府駐倫敦和莫斯科——美國對外外交的兩個最重要據點——的外交大使。且美國政府機關中至少有五個內閣部門和其他十四個機構都和該理事會的整個戰爭與和平研究計劃（War & Peace Studies Project）時有相互連繫的關係。在此六年期間，單只洛克菲勒基金會一私人財團便捐了美金卅萬元於該會。自始起，該會

的廣泛研究的最終目的便是獻計於政府，直接影響它的決策方針。在1940年三月各研究小組的第一次會議後，他們影響政府決策的願望便馬上實現。以著名地理學者Bowman (Johns Hopkins 大學校長) 為首的領土小組認為格林蘭 (Greenland) 對美國當時具有重大的戰略地位。在三月中旬呈給羅斯福總統和國務院的建議書上討論到德國可能佔領丹麥，進而宣佔丹麥的殖民地，包括格林蘭，將對美國構成莫大的威脅。該小組建議引伸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到格林蘭以阻嚇德國的侵佔。1940年4月初旬德國攻佔丹麥，美總統立即招見Bowman 以商對策。爾後於四月十八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羅斯福聲明表示格林蘭乃屬美洲大陸的一部份，同年底，在內閣會議上他展示了領土研究小組的建議書並稱基於此建議他已得到一些解決格林蘭問題的方案。

為了加強他們的影響力，理事會的主要成員又於1940年年中於紐約一上流社會的俱樂部世紀協會 (Century Association) 組一個叫「世紀團」(Century Group) 的壓力組織以進一步影響政府決策。該團的發起人之一便是理事會的董事 Francis P. Miller。在1940年7月25日的會議上，世紀團決定美國應幫英國。具體地講便是以五十艘驅逐艦和英國交換在西半球的基地並要英國保證絕不將艦隊投降賣給德國。8月1日 Miller 和另四團員將此建議帶到白宮和羅斯福及其他內閣人員討論。第二天羅斯福的內閣會議在討論過世紀團的建議後決定去探測英國可能的反應。就如此，英美開始交涉而於1940年9月達成以驅逐艦交換基地的協定。此協定的簽訂結束了美國在二次大戰中保持中立的偽姿。

在國務院成立了自己的長期規劃機構後，理事會的領導人們經由個人和許多高層決策者的私人關係亦經常和國務院的戰後計劃人員聚會。譬如擔任戰後計劃的國務院特別助理經濟學家 Leo Pasvolsky 是理事會大部份成員所熟悉的人物。和該會總裁 Davis 一樣，Pasvolsky 成了國務院和理事會之間主要聯絡者。他經常和戰爭與和平計劃組會晤並將他們的建議帶回給國務院參考。他也常參加經濟和財政組的會議，並與理事會的領導人們會聚。1940年6月20日在理事會召開的特別大會上他表示理事會和國務院間密切合作的必要和他樂意幫助

該會的願望。其他國務院高級人士也強烈支持該會的研究計劃。好幾次，國務卿和副國務卿都寫信到該會稱他們的工作是極端有用且具無比的價值。

大規模策劃的開始：1940年夏秋

1940年5、6月間德國軍隊橫掃法國的消息震驚了理事會和政府官員。他們突然間面對着德國可以進一步擴張進而打敗英國且佔據它的艦隊和整個帝國的新危機。因此在該會和政府決策人員的領導下立即開始了大規模應變當前緊急情況和未來可能突發事件的策劃研究。

幾近十年來美國領導人所關心的最機要問題便是西半球是否能自給自足？或需要與外界貿易以維持它的繁榮？到底美國需要多少世界的資源和領土以維持它的力量和繁榮？多年來美國國內的馬克斯主義者和自由派常就這些問題爭論。馬克斯主義者認為資源和領土的擴張一直是膨脹中的美國資本主義所需要的，並道破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基於此需要而訂的。以下我們將看出理事會對國際新局勢的反應如何符合馬克斯主義者的看法和如何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1940年夏在財經組的領導下理事會開始一大規模研究以解答上列數問題。他們將整個世界分為四大自足自給區——西半球、大英帝國、歐洲大陸和太平洋區。他們發現德國所支配的歐洲大陸比西半球的經濟自足力強。為了能和德國的經濟力抗衡，西半球必需和其他區域結合在一起。最初他們考慮西半球和太平洋區的結合。如此，太平洋區所需的機械、車輛、棉花、石油產品、化學品、鋼鐵等可由西半球輸入，而同時西半球可由太平洋區進口橡膠、黃麻、錫、棉紗、絲和糖。如此兩區的結合雖將使美國成為最大的受惠者，然而並未能完成解決兩區推銷過剩農產品的共同問題。因此以大量進口農產品的英國便被加入考慮，進而形成了所謂「西半球，大英帝國和遠東」集團的構想。理事會的策劃人總結地說美國的「國家利益」最起碼應包括自由使用大英帝國，遠東和西半球的原料和市場。現在他們所需的便是去說服政府和整個國家接受他們所定義的「國家利益」。

基於上述「國家利益」的觀念，理事會繼而導出一系列的軍事、領土及政治上的策略以便確保美國經濟體系的擴充發展。在1940年10月中旬，財經組總結了它有關美國未來政策內涵的廣泛研究，並寫成一備忘錄（Number E-B19）。此備忘錄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推薦羅斯福總統和國務院「擬訂政治、軍事、領土和經濟上的必要措施以爲美國未來在德國統治區外，包括英帝國，西半球和遠東，扮演領導的角色鋪路」。

依理事會的看法，歐洲戰事有兩重大特徵是和國的處境息息相關的一德國控制歐洲大陸和英國繼續抗拒德國且侷限了後者的領土擴張。至目前爲止，因門羅主義的影響美國的軍事政策一直是只針對西半球的安全而設的。現在因英國阻止了德國侵略使得整個歐洲大陸區以外的世界開放給美國。爲了乘此機會在非德區促長和維持一以美國爲中心的新經濟秩序，理事會的人認爲必要的軍事擴充和參與是不可缺的。他們並認爲保護大英帝國一西半球和太平洋區域剩餘農產品不可或缺的市場一乃必要之舉。

備忘錄E-B19且表露了理事會一貫鼓吹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美國要在世界上佔有不可置疑的勢力的最重要條件便是迅速完成重整軍備的計劃」。日本的擴張可能危害到美國在非德區的勢力。理事會認爲這方面的威脅「假如可能的話以和平方法解除，否則可訴諸武力」。也就是說，若日本威脅到美國對歐洲大陸以外的整個世界的控制，美國應不惜和日本一戰。

備忘錄於結論裏扼要地指述「爲了達成美國在非德區的軍事及經濟上的霸權的完整政策下的三個基本要素」，首要條件乃是維持目前英國繼續抗德的局勢。另一要素乃是和友好國家攜手合作以防範外來勢力威脅美國和西半球的經濟繁榮及安全。最後，因在可見的將來德國勢力可能和此計劃中的非德區新秩序並肩相存，由西半球、大英帝國和遠東所組成的集團必需能和德國抗衡。

1940年10月19日，在呈送給華盛頓當局以前，戰爭和和平研究組的成員亦參加了財經組檢討此備忘錄的會議。國務院的主要戰後策劃人Pasvol sky也參加了此會議。他對理事會所提的

新世界勢力藍圖表示贊同。他相信美國必需據有比西半球更遼闊的空間，並認爲美國在其勢力被侷限於僅西半球區的情況下終必參戰以贏得更大的活動空間。他的結語很清楚地乃是沿循理事會的觀點。

日本問題

日本的拒絕扮演美國所指派的附屬角色乃是聯合整個非德區的主要障礙。所有戰爭與和平組們都承認日本乃是個膨脹中的勢力且對理事會的計劃構成一大威脅。爲了防止日本佔領東南亞進而破壞美國對該區接近，理事會各研究組的重要成員在政府的代表參與下於1940年底開了一連串討論會。1941年1月15日他們發表了代表理事會一致看法的備忘錄E-B26「美國遠東政策」。備忘錄開頭便表明牽制日本對東南亞的擴張乃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方必須先發制人，不可落於日本行動之後。美國在東南亞的主要利益可分雙層。第一乃是經濟上的：「菲律賓群島，荷屬東印度群島，和英屬馬來西亞的自然資源，無論在戰時或和平期，對美國都是非常重要的；若這些島嶼被敵對的勢力佔有則美國的經濟活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第二，在戰略上的考慮，必需防止日本佔據東南亞，因若日本控制該區則將威脅英國的資源補足和它在亞洲的地位進而削弱了其抵抗希特勒的戰爭。

爲了制止日本南進理事會提出了下列三個並行方案。第一是盡力將軍援資助中國以便牽制大量的日軍於中國大陸。第二，在取得英國和荷蘭的同意下派遣海空軍到東南亞區以加強其防備力量。最後，切斷日本戰略物資的補助。因日本的許多緊要物資乃需要靠美國供給，若美國的拒絕輸出將大大打擊日本的戰略能力。又美國以自己國防需要爲藉口向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購進戰略物資亦可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尋求物資供應。

大區（GRAND AREA）

所謂的大區，也就是1941年間由美國領導下的非德區，它的界限只是為應付1940到1941年緊急狀況而暫定的，而它的理想界限要比實際上大得多——也就是一個由美國控制的經濟體系。

1941年6月，財經小組認為大區的整合工作應該由短程的作戰與防衛觀點作起，然後逐漸在戰後形成一個由美國領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所以下一步工作是決定用什麼方法使這個區域在經濟上統一起來。

1941年6月，致總統和國務院的備忘錄勾畫出委員會對國家利益的看法，及大區在美國經濟、政治及軍事策略上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編號E-B34的備忘錄，總結了大區對美國政策的意義，它在目前戰時的作用，以及它在戰後可能的角色。財經小組認為，假如美國經濟體系沒有大幅度改變的話，就不可能維持一個自給自足的美國西半球經濟。

委員會的成員之一W. W. Riefen認為，為了避免美國經濟的改革，必需尋找一個使美國經濟能夠自由活動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必需有工業所需的原料。經過詳盡的討論後，委員會認為大區就是理想中的「活動空間」。大區的範圍最後定為西半球，大英帝國，大英國協的殘餘部份，荷屬東印度，中國及日本。建議書上並說明經濟上整合及軍事上防衛這個區域的重要性。譬如說，失去英國將會大大地強化生產過剩的問題，而做成失業。

軍事上防衛大區牽涉到面對德日兩國的危機。因為德國佔領區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因而不可能用封鎖的方法削弱它，長遠來看，它構成英美區最大的威脅。

E-B34建議應該防止北非，近東及蘇聯落入德國掌握，並設法使德國不能鞏固它在歐洲的經濟所得。

財經小組的研究說明，不論是否由納粹統治，一個統一的歐洲對美國是非常危險的。H. F. Armstrong也在1941年6月指出，決不能允許一個統一的歐洲出現。因為統一的歐洲將會強大到威脅美國的大區。統一的歐洲基本上和美國的經濟系統無法相容。至於日本，由於它的擴張主義，已經深入東南亞，造成大區的直接威脅。

財經小組強調整合大區的重要性。因為大區在戰時可以提供作戰和防衛的經濟基礎，也是戰後秩

序重建的經濟基礎。因此研究的重點在於如何整合這個區域。

大區因此被當作一個核心區域來考慮，它也可能延伸而包括更多國家。正如財政部顧問Jacob Viner在1941年5月所說的「擴張大區的組織」將是美國的國策。

將不同的區域整合到大區內的工作牽涉到如何在不同的國家和區域之間達到經濟調合，委員會的專家強調使用經濟手段。有關這個問題最早的備忘錄是在1941年7月提出，它指出兩個歷史上的經濟整合方法，第一個是關稅同盟，也就是利用最惠關稅將相同經濟上互補關係的國家結合起來，也就是原料生產區和工業區結合。大英帝國就是這種結合形態的好例子。這種結合方法可以經由最惠關稅、投資、殖民化及徹底的政治控制來達成。

委員會的計劃也說明亞洲熱帶區對美國而言是最重要的經濟補充區，這個結論對將來的發展有重大的含意。

委員會的計劃人員認為上述的兩種方式都要採用。經濟競爭力較強的國家可以用最惠關稅納入系統，至於經濟補充區，貿易障礙基本上不存在，所以必須用別的方法製造出這些區域的依賴性，譬如保證非工業國原料輸出的市場。假如這種協議失敗，就不妨使用投資或政治、軍事的支配，以控制這些地區的資源。

在建議書E-B34的結尾，財經小組概要地提出來關於整合大區的研究專題。最主要的有關國際金融機構的創立，以便穩定貨幣，以及國際銀行，以便協助落後地區的投資與發展，也就是說，他們很早就指出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的需要。

以上關於大區的分析含蘊着某些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保衛不列顛及建立堅強的英美同盟的運輸能力。大區的整合和世界性的戰後組織都需要依賴海運。英國的危急情況使這個需要更形逼切。

美國政府和委員會密切連繫的結果，終於接受這些建議，並且在1940年至1941年展開行動，包括保衛不列顛及防止日本進入東南亞。很明顯地，委員會和美國政府有一致的世界觀。故事從這裏才開始。其後幾年，很多證據都顯示出委員會實際上是美國戰爭目的的設計機構。（未完待續）

美國中學裡 越戰史的教學

葛屋節譯

書評作者：ANDRE G. KUCZEWSKI

評論書籍：WILLIAM L. GRIFFEN AND JOHN MARCIANO, TEACHING THE VIETNAM WA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CHOOL TEXTS AND AN INTERPRETIVE COMPARATIVE HISTORY UTILIZING THE PENTAGON PAPERS AND OTHER DOCUMENTS.

譯按：越戰結束將近十年，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又如何把他們的看法，傳授給他們的下一代？看了這篇書評，很叫人想起從前在台灣所受的教育。



在這一本書中，*GRIFFEN* 及 *MARCIANO* 二君，將二十八本有關美國參與越戰的中、小學教科書與一些資料相對照，核對其有關越戰的詮釋。兩位作者很快就發現，這些教科書的作者們，故意抹煞證據、曲解事實。對於美國官方有關越戰的虛浮而顯然引人誤解的解釋，教科書的作者們不但不加置疑，而且對華府有關越戰悲劇的說法，應聲蟲般盲目地接受。

二十八本教科書中，本本都強調美國是爲了“護衛自由”而“被迫”參戰。美軍被描述爲遏止“侵略”的勇士，北越及 *NLF*（南越民族解放陣綫）軍則是圖謀顛覆的“恐怖份子”和“侵略者”。然而，越戰絕不是像西部電影那樣單純的好人奮戰壞蛋的故事。美國國防部的文件證明，事實與官方說法有着一大段距離。新聞界照官方說法報導給大眾，而教科書的作者們也跟着新聞界學樣，未能超

越官方說法去書寫歷史。對於美國在越戰中所施行的戰略，如以化學劑脫除林葉，不分軍民區濫施轟炸等殘酷行徑，這些教科書都絕口不提。仔細分析起來，美國的越戰政策，不過是早期法國在越南之殖民主義的延續，但是教科書的作者，對於美國以其一貫外交政策爲本所形成的對越政策，未曾有任何質疑。

GRIFFEN 及 *MARCIANO* 二君相信，美國中學生，教師及學生家長們，在看完這些教科書之後，絕想不到美國在越戰中，曾犯了有如納粹在二次大戰中所犯那般嚴重的罪行。這些教科書所起的作用，在使學子們毫無異議地接受官方的說法，使他們相信美國之介入越戰，是基於崇高的政策，或者只是一個錯誤，而非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結果。

（節譯自 1983 年 4 月份
MONTHLY REVIEW）

• 卜 今 •

韓國人權運動與 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記一次金大中的演講

今年五月底南韓反對黨領袖金大中應「亞洲人權委員會」之邀，在芝加哥從「韓國人權運動與美國所扮演的角色」為題發表演說。金大中指出，今天全斗煥的獨裁統治，較諸李承晚、朴正熙時代，對人權迫害更烈，對民主壓制更凶。在論及南韓至今未能實踐民主的原因時，他認為司法、立法與輿論三種力量都受制而軟弱無力，甚而淪為獨裁者的工具；他又列

• • • • • 這是您的刊物 (稿約) • • • • •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是您的刊物，是所有關心台灣、贊成民主者共同的刊物，而不是作者、編者少數人的。我們最大的目標，不單是在林林總總的海外刊物中增加一份可讀性高，富有知識與資料的刊物而已。我們更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爲一個橋樑，溝通不同的意見，增加對台灣的關懷與認識。讓我們知道，有共同理想的人到處都有，而且愈來愈多。讓有心人士不覺孤立無力，在海外或回國能爲我們的故鄉，爲社會正義而努力。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您的來稿，或來信討論、批評、或捐款、介紹朋友。我們題材很廣、只要跟台灣有些關係。方式不拘，專文，隨感，漫畫，文藝等等都行。我們力求包容性大，只要不流於謾罵或下實，各種意見立場都歡迎。當然，我們會有開放

而慎重的審稿，以向讀者負責。代表我們意見的，將以本刊，本會與編者按語表達。長度亦不限，但最好在一萬字以下（這是篇幅所限），過長者請先與編者聯絡。

請橫寫。我們有稿紙備索。我們很窮，暫時發不出稿酬，但可以贈送五本給您的朋友（來稿請同時開列名單）。

關心台灣，提倡民主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但一些嚴峻的事實，特別陳文成事件的先例，使大家都很小心。我們對來稿來信，都將絕對保密。歡迎筆名聯絡，但請附上通信住址與電話。

來稿與信寄到：「民主台灣」編輯部

O S D M 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舉高漲的外債及分配不均的財富為社會不安的根源。在分析美國在南韓人權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時，金大中指出里根總統邀請獨裁者全斗煥作為第一個訪美的國賓，與美國口口聲聲支持人權、民主的外交辭令完全背道而馳。更指責美國從安定為藉口支援獨裁政權，其咎難辭，正如蘇聯必須為波蘭的情況負責一樣。

從金大口中述說的南韓裏，我們隱隱地瞧見了一幅台灣的倒影。誠如金大中所說的，建立一個全民支持的民主政府，要由我們自己去爭取來。茲將金大中演講內容評介如下：

□ 韓國人權現況

人權在韓國從未曾像今天這般嚴重地被殘害過。事實上，若與今天的全斗煥政權相比，1948年到1960年間的李承晚政府簡直只是小巫。為了要鞏固他獨夫專政的局面，李承晚的確經常在選舉時作弊。然而，只要不威脅到他總統的寶座，李承晚還相當尊重某些基本的民權和人民的自由。在當時，新聞輿論也比較自由，總統是經由全民直接選舉，政治上的反對勢力在政治運作中也正常地發揮一定作用，地方政府也保有自治權，司法機構也相當獨立自主。到了朴正熙時代，人權的保障快速地被破壞。朴正熙運用「韓國中央情報局」這個特務怪物從事白色恐怖活動。他又離開韓國人民以便自己的極權統治。然而，那個時期韓國的人權狀況仍比今天要好一些。比如，除了一九六一年政變後的一段短時間，反對派的政治人物從未像今天這樣被禁止從事參與政治活動。輿論機構也未曾像今天這般被迫合併，甚至關門，當時的新聞審查也不如今天這般苛刻。雖然那時的工會也被政府操縱，對工會活動的限制却遠比今天寬得多。

自全斗煥奪權以來，至少有七百名新聞記者被迫“退休”，只因為他們要求輿論自由。至少有一百位學者由於政治理由被解聘。有人估計，每一所大學院校至少有一百到兩百個特務滲透。一條新法令規定每校每年至少要開除百分之卅的學生。政治犯的人數幾乎倍增，刑罰也較前重許多。工會會員人數大減，數十個以前較活躍的工會被解散。

這不只是我個人的觀察，今年二月份里根政府公佈的“人權報告”中也有類似的分析。這份報告

中有關韓國部份的重點如下：

1. 一個由軍方支持掌權，却不受一般人民支持的總統
2. 長期使用刑求
3. 對人犯殘暴非人道的待遇
4. 政治性的案子沒有公開公平的審判
5. 任意逮捕，隨意判刑
6. 侵佔私人家產
7. 監視私人活動，監聽私人交談，檢查私人郵件
8. 對向外國人批評政府的人，予以拘捕下獄
9. 對任何批評政府的人，予以鞭撻
10. 禁止設立同業工會，只准各別公司設立工會
11. 禁止罷工，剝奪工人協商權
12. 假藉維持民主治安之名，解散政黨
13. 政治犯由一九八一年底的二七二名增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四一七名

□ 韓國人權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關係

韓國人權運動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的韓國政府。這個目標至今未能達成，有五個原因：

- 第一：韓國自日本手中解放，以及第一個政府的成立，大部份是依賴外來勢力。人權與民主必須靠自己贏取，而不能只由別人施捨。
- 第二：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原本應負有建立民主政治基石的歷史任務。然而他違叛民意，逕自與親日勢力結合以鞏固他自己的地位。他更以反共與國家安全為他獨裁的口實。這不幸的先例，成為後繼他的其他獨裁者們的最好樣板與藉口。

第三：司法、立法、輿論這三項實踐民主基本的要項不但本身軟弱無力，有時甚而淪為獨裁者的工具。

第四：所謂的“經濟成長”帶來了兩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不斷高漲的外債及財富的過度集中。今天南韓大約有四百億美元的外債，少數人控制了國家大部份的財富。因此，一般人民十分不滿現狀，社會情緒普遍不安。

第五：一小撮有權勢的軍人不時從事政治鬭爭，軍事上的決策往往取決於政治目的。結果，政治制度與國防兩者都深受破壞。

無懼於種種反民主的迫害，韓國人民仍不斷地為人權與民主奮鬥。因為：

第一：韓國人民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這是實踐民主的有利條件。

第二：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古時的神話以至今日的人權運動，韓國人民始終注重自由、公正、人性尊嚴等等民主的精神。

第三：近年來韓國人民對建立民主自主政權的意願格外強烈。尤其是：一九五二年反李承晚獨裁政權的事件。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的學生抗暴事件，一九七一年的總統選舉事件，一九七九初朴山人民抗暴運動以及一九八〇年光州的反抗運動。全斗煥無論再如何壓制人民對民主的渴求，韓國人民勇往民主邁進的步調是不變的。

第四：韓國人民無論在教育、文化上都已有充份適當的準備去實踐民主，認識上並不遜於美國人民。

這些條件賦予我們智慧與勇氣除萬難在八十年代建立我們自己的民主。韓國人民就像小草，我們或曾被壓入泥中，或曾被拔起折斷，但終究我們會站立起來的。

三 美國扮演的角色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政府的一些作為深深傷害了韓國人民。比如，為了交換朴正熙遣送韓國軍隊前往越南作戰，美國鼓勵朴正熙修憲以便競

選連任第三任總統。在朴正熙被暗殺後，美國雖然表示支持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在全斗煥以恐怖血腥奪權的過程中，美國表現却與支援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馳，尤其當一九八一年里根總統邀請全斗煥做為第一個訪美的國賓時，更是對民主人權的諷刺與侮辱。

韓國人民將失望與不滿洩憤於焚燒“美國文化中心”以及美國國旗等等事件中。我雖然不同意此等破壞行為，但我能深刻體認人們的情緒，與其說是反美，不如說是反對美國支持當今的全斗煥政權。

美國支持獨裁政權的理由是安定為國家安全的要件。然而事實上若人權不得保障，安全就無以維持。人權是安定的基礎，在美國是如此，在韓國亦然。

蒙哥馬利元帥曾說，英國將士所以能奮勇與德國作戰，是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居住與言論的自由。與英國人抵禦外侮不同的是，今天韓國是兄弟相爭。南韓人民若要與他們北韓的同胞們爭戰，他們必須要有值得去防禦，值得去爭取的理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尊重人權，有言論自由以及讓人民擁有基本參政權的政府。

美國可以採取以下的步驟幫助我們建立全民支持的民主政府：

第一：立即停止對獨裁者的援助

第二：設法使南韓軍隊在政治上中立

第三：公開聲援南韓人民爭人權、爭民主的運動

第四：支援南韓人民爭取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組織工會與農會的自由，學術自由以及參政自由

第五：美國的輿論界報導南韓人民爭取人權至少應該對像波蘭的報導一樣。歸根結底，美國對深受殘害的南韓人權難辭其咎，就一如蘇俄必須為波蘭的事件負責。

美韓兩國的傳統都建立在對人性的尊重，而不是武力上。美國必須認識到，一如美國本身，韓國的穩定，安全與繁榮都建築在充分實踐基本人權與民主政治上。沒有人權與民主的國家安全，一向是從未變成功過的政治魔術。若美國輿論能認識到這一點，不但對人類爭人權與民主的大業有所贊助，也更符合美國本身的利益。剩下的，我們韓國人自己來做。

吳偉林



華達的工人奮鬥史

——電影「大理石人」
「鐵人」中的波蘭工人。

「大理石人」、「鐵人」這兩部東歐集團最重要的電影，把波蘭三十年來工人運動史生動地呈現在觀眾的面前。而吳偉林這篇評介文章，更是脈絡分明地介紹了兩個影片的時代背景以及電影本身的情節。把曲折複雜的波蘭工人運動史交待得如此簡潔了然，值得所有想了解團結工運，想借鏡波蘭工人反抗經驗以助台灣民主運動者細看之。

—— 編者按

今年六月二十日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再度巡視他苦難的祖國——波蘭，從新聞節目的報導中，可以看到教徒的熱忱比起四年前他首度流巡，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當時場面的氣氛，很顯然是憂傷的，沈重的。四年前，那裏充滿希望的樂觀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了。這四年之間，波蘭的變化，在一九八〇年團結工聯成立達到高潮的頂點。在一九八一年底軍人掌政，實施戒嚴法，肆意拘捕工人領袖，而請工聯被宣佈為非法組織時，達到前所未有的低潮。波蘭工人、知識份子、學生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再次受到統治階級的惡情打擊。一個理想的夢的破碎，一種再怎樣奮鬥也是徒然的悲哀，對波蘭人民心靈的摧殘，其痛苦大概也只有天為的正義可以緩和一二罷了。

基於這種了解和同情的心情，重新再看華達的「鐵人」(Man of Iron)，片中團結工聯贏得勝利所帶來的興奮，猶如明日黃花，令人感嘆不已。似乎波蘭工人的命運已走到窮頭，每次罷工、示威，固然會迫使當權者讓步，但是那樣的勝利却永遠是短暫的，而必然幻滅的。

工人挑戰共產主義

二次大戰後成立的波蘭共和國(後改為波蘭人民共和國)，信奉共產主義，以謀求工人福利為主旨，却屢屢遭受工人階級罷工、示威的挑戰，無疑是個令人難堪的諷刺。一九五六年，史大林死後第三年，發生了波茲南事件。事情起因是波茲南地區一個工廠的員工認為行政單位在扣繳所得稅的方法上有錯誤，導致他們的損失，屢次陳情、抗議，行政官僚都沒有做任何有效的改正。於是在六月二十八日該廠員工集體罷工，並且朝市中心的方向遊行。消息傳開來，波茲南的其他工廠工人也加入行動。官方開始捉人的消息傳開來之後，激怒的工人便佔領公安部，於是武裝鎮壓便開始了。事件之後，死亡人數的估計約有二百人。波蘭官方新聞媒體，異口同聲指責悲劇的發生是美帝國主義的煽動。

執政的波蘭工人聯合黨(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發生嚴重的分裂，遵行史大林政策的保守派失去黑魯雪夫及黨內大多數的支持，領

導權落在高繆卡(Gomulka)手中，高繆卡掌政後有程度的開放自由化。工人的自治權落實於各個工廠成立的「工人評議會」(Workers Council)，中央統籌的經濟計劃已開始放鬆，藝術、言論的自由也有明顯的放寬。基本上，這個被稱為「波蘭十月」的改革運動所以成功是由於蘇聯內部的變化，亦即黑魯雪夫批判史大林政策所致。波茲南事件只是暴露波共在政治上、經濟上一些敗壞的弊病而已。當然，波蘭的知識份子，無論是黨內亦或黨外，要求改革的呼籲，也發生些影響。

知識份子開始反抗

知識份子對黨的失望，是在一九六八的學生運動之後。「波蘭十月」的自由化、民主化雖然有可能普及到社會的每個層面，如果改革能夠持續的話。但是這項改革不久就受到各層黨工的抵制，因為他們的特權和收入會受到嚴重的短少。同時黨在各方面的領導地位瀕於喪失，加上蘇聯入侵匈牙利的前車之鑑，高繆卡開始公開譴責支持自由化的黨員、知識份子。整個改革的步調慢了下來，「工人評議會」的權力也被架空，一切又開始恢復到老樣子了。隨著秘密警察權力的擴大，抗議之聲漸漸消失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官方宣佈米克維茲(Mickiewicz)的戲劇祖先之夕(Forefathers Eve)禁演。因為該劇描述的事件發生在帝俄時代沙皇統治下的波蘭，劇中充滿反俄的意識，愛國學生便遊行集結到米克維茲的紀念碑前，要求開放禁令。警察蜂湧而至，驅散人群，並逮捕數名學生。二月，學生又集體簽名，要求開放禁令，秘密警察開始進入校園。到了三月，華沙大學的學生開始示威，一方面抗議教育部開除二名在一月份被警察拘捕的學生，一方面重申波蘭憲法所賦予的言論、集會、結社、以及「遊行」和「示威」的自由。著名的「三月事件」於焉開始。學生和警察及軍隊的對抗持續了三個禮拜。各地大學的學生相繼加入示威隊伍，部份的教授也公開支持學生，但是波蘭最大的社會勢力——工人組織却始終觀望。原因很簡單，學生運動到後來所要求的是整個體制的民主化，以及憲法所賦予的各項自由的保證。這些並非工人最迫切需要

而願意以生命的代價去交換的。結果，學生什麼也沒得到，單單華沙大學就有一千六百名學生因此失學，這些學生陸續被逮捕入獄，有的從此轉入地下活動。黨在處理這件「三月危機」時，把校園的騷動歸罪於猶太人，企圖製造一次全面的反猶宣傳，諷刺的是他們的開山鼻祖馬克斯却是猶太人，這件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官方宣佈貨品價格調整，（其實在食物項目上全部漲價，而在原來價錢賣不出去的貨品則降價）。十四日但澤(Gdansk 原德屬時名Danzig)造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此項不誠實，而不負責任的政策，同時向市區遊行。警察企圖橫欄，雙方的對抗便逐步升高，軍隊也加入衝突，並且奉命可以自由射殺暴徒。甚至坦克車也開進市區。但澤工人的行動，開始有吉尼亞(Gdynia)地區的工人響應。接著其他幾個附近城市的工人也跟著行動，武裝鎮壓也無情的展開。由於死亡人數的激增，執政黨內部派系鬭爭也尖銳化起來，高繆卡因為對情勢判斷錯誤，誤把對工人對他個人的攻擊視為反革命，而濫用武力，造成黨與工人階級的分裂，被迫下台。接手的吉力克(Gierek)開始安撫工人，但是沿岸城市工人聯合起來的罷工委員會提出了十二點要求，其中包括與吉力克的直接談判。吉力克屈服於這項要求與罷工委員會談判，原則上接受工人的要求，罷工便正式結束。這些要求包括罷工委員會的合法地位，行業工會的獨立地位，和新聞媒體的誠實性。

知識份子與工人的聯合

吉力克掌政後面臨最大的難題便是經濟問題。由於高繆卡時代的錯誤，在教育政策上的偏差，波蘭工業的生產力逐漸衰退。人才匱乏，設備陳舊，加上行政官僚的腐敗，和中央領導單位的顛覆，使得國內的生活愈加困難。物價上漲在工人眼裏，只是黨將自己的錯誤，強要工人共同承擔罷了。為了挽救波蘭的經濟，工業現代化是必然的。吉力克的方法是向西方大量引進資金和技術。由於和西方的接觸開始頻繁，吉力克不得不擺出一副「開明」專制的臉孔，在文化上的活動做相當程度的放寬。但

是在經濟問題上，吉力克政權的無能却沒有因為西方資金的介入而改善。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政府宣佈物價上漲，第二天拉東(Radom)地區的工人便罷工抗議。特別治安部隊也開始街頭暴行。接著烏沙(Ursus)地區的工人也走到街上來。其他地區也有零散的工人罷工。雖然治安人員的暴行鎮壓有如恐怖份子，政府還是只得取銷預定的漲價。在這次行動中，知識份子，學生，甚至教會都公開的對工人表示支持。事件之後知識份子成立了一個叫「工人自衛委員會」(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的組織，發行地下刊物，對參與行動者給予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協助，並指控政府在鎮壓反對運動中的違法行爲。雖然政府極力鎮壓，罰款、凌虐、監禁，甚至暗殺都派上用場，但是發自社會各個層面的批評之聲，愈來愈強大。這迫使吉力克在內部採取整肅行動，同時在文化活動的尺度上增加更大的彈性。就在這段時期，對一黨獨大的波蘭現況的批判開始成爲電影的主題，而陸續出現。

極權統治下的拍片工作

安得烈·華達(Andrzej Wajda)終於獲得波蘭文化部長的准許，將準備了十四年的劇本「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拍成電影。華達生於一九二六，原先唸的是美術，後來轉唸電影(Lodz Film School)。在五十年代，他所拍的電影都以二次大戰德國佔領下的波蘭爲背景。六十年代拍的「無辜的魔術師」(Innocent Sorcerer)描述當代波蘭青少年的疏離感，不爲當局所喜，因而失去在國內拍片的機會。這段期間，他只得與西歐片商合作。七十年初期，文藝政策的放寬，他拍了「婚禮」(Wedding)一部關於波蘭追求獨立的歷史。七四年的「樂土」(Land of Promise)描述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在波蘭萌芽的過程。再來便是這部被視爲戰後波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也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最重要作品——「大理石人」。他原是波蘭八個電影單位之一的×單位負責人，這個職務據報導已被解除了。除了電影，他也執導了不少舞台劇。華達的事業，多少反映出在極權統治下拍片的痛苦。電影企業在東歐國家均是國營的，電影

製作人——主要是導演和政府的關係便很微妙了。一般來講，電影工作者如果想表達他個人觀點的話，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大費製作符合官方政策的「宣揚國策片」來爲可能會出問題片子護航。或者是用晦澀的象徵手法，曖昧地詮釋劇情。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不失藝術良心，又不用擔心出問題。苦的是一般大眾無法消受。蘇聯的安得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今年在坎城與布烈遜(Bresson)同得導演獎的便是最好的代表。華達走的是第一條路，用「以古喻今」的手法，從過去的波蘭，過去的人物的遭遇來反映今天仍然存在的問題。一般來講，即使電影檢查尺度放寬了，電影工作者心中仍得有「自我檢查」的尺度在，以免真的出問題。像在波蘭這個所謂的共產極權國家，電影劇本得先送審的。「大理石人」的劇本幾乎連續送了十四年才獲准開拍。審理單位是文化部(和台灣新聞局的功能不完全雷同)。問題大的話，可能送進政治局去。電影拍成後，任意修剪，甚至禁演也是常有的事。罪名可以荒謬到像台灣常用的「混淆視聽，挑撥國家與人民的感情」等等。華達在這種情況下，敢拍這種片子的勇氣固然值得欽佩，能把這麼複雜的「題材」拍得如此渾美、成熟，而且文理清晰，直陳工人未敢公開明言的心語，這種藝術上、道德上的成就，可能是更重要的。

「大理石人」——模範的出現與消逝

「大理石人」的時代背景始於戰後波蘭重建時期，結束於七〇年代中期。西方影評人常用「東歐的大國民(Citizen King)」來講「大理石人」的涵蓋面。整部電影透過一個雄心勃勃的女製片人阿奎尼斯卡(Agnieszka)的眼中，來看一個砌磚工人巴庫(Birkut)如何從國家英雄變爲國家的敵人的一生。阿奎尼斯卡從戰後的新聞片中，經常可以看到有關模範工人巴庫的報導。例如他的砌磚小組又打破記錄，於一小時內砌了三萬塊磚。當時，戰後波蘭的社會主義重建工作，花了很多心血在廠房，住宿的營建。巴庫的效率，正是代表社會主義制度有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象徵，於是透過黨的安排，巴庫到全國各地去做示範。他生命的最高峰是被選爲模範工人，黨爲他製造了一具大理石彫

像，陳列於人民英雄堂，他的肖像到處懸掛。但是這些風光，到了六十年代就完全消失了。似乎在歷史上這個人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引發了阿堇尼斯卡的好奇心，決定拍一部關於這個人的電視紀錄片。於是她走訪了當初拍新聞片的導演，巴庫的朋友，妻子，以至當初保護他，後來拘捕他的治安人員。從這些拼湊出來的資料，巴庫從一個被冷藏在倉庫的大理石彫像，出現在銀幕上的效率專家，變成一個活生生的，充滿了正義感，誠實的工人。

巴庫的崛起，成為人民英雄，據新聞片導演的講法，完全是他的功勞。國家那時需要英雄來鼓勵生產的士氣，提高人民的信心，但是最好的「樣版」都已被利用過了。所以他便利用砌磚工人工作的情況拍出一段新聞片，宣傳部門看了很喜歡，巴庫便莫名其妙地成了英雄。為了拍一部巴庫打破紀錄的片子，有關部門令巴庫一組人休息一禮拜，天天供給一般人吃不到的肉食。事前，又召來一組理髮師替他們打扮。結果當天破了紀錄，但是巴庫的雙手却伸不起來。在這個新聞片導演口中，巴庫完全是他攝影機製造出來的英雄。

巴庫成了英雄之後，又當選為工會代表，但是天真的巴庫却不知好歹的為工人爭取權益。一九五二年因公開抗議他朋友的被捕，他悲慘的下半生便開始了。由於公開批評黨中央的政策，他被捕入獄。他的妻子被迫搬出豪華住宅。一九五六年，高繆卡掌政後，他被釋放。由於拒絕妥協，他的麻煩沒有減少，在他簡單的心靈中，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錯的決不能講成對的。於是他的妻子離開他，他的朋友離開他，他成了人見人怕的疾病。終於消失在這些人的生活圈子。阿堇尼斯卡一直到尋著巴庫的兒子湯柴克(Tomczyk)，才知道巴庫在一九七〇年的但澤船廠的罷工中犧牲了。湯柴克知道她的意圖之後，決定幫她完成這個片子。電影結尾時，這兩個人出現在電視台辦公室的走道上，準備說服阿堇尼斯卡的上司，完成這部片子。

華達在「大理石人」中，相當含蓄的揭露黨對新聞媒體操縱所造成的欺騙及虛偽。那樣一個社會在五〇年代如此，到了七〇年代，情況並沒有改進多少。從巴庫後來成為工廠技術官僚的朋友口中，另一支控制分歧份子的力量便是秘密警察，以及連帶而來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壓迫、騷擾。在這樣巨

大壓力的情況下，追求真實及尊敬所要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固然巴庫在這場戰鬥中是被擊敗了，希望並未完全消失。他的兒子湯柴克顯然繼續走這條未完之路。

「鐵人」——團結工聯的道路

一九八一年華達的「鐵人」終於講出在「大理石人」裏，還沒講完的故事。這部電影以團結工聯的成立為背景，詳述湯柴克從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受挫以後，到成為一九八〇年但澤船廠罷工的主要活動份子的一段心路歷程。這部電影，華勒沙曾數度出現，演他自己。但是後來却被他批評為「太極端，不太真實，過於挑釁」。在坎城得了金棕獎。這部電影對於團結工聯的義意，在西方影評人眼中，就像蘇俄片「十月革命」對布爾雪維克一樣；將「團結工聯」淨化成救世軍。但是，縱使人物是虛構的，片中所描述的情況却是實在的。

「鐵人」的敘事結構和「大理石人」是一致的，對於湯柴克的事蹟，我們都是透過他的朋友，鄰居、妻子的口述才得以一窺全豹，而這些事蹟的陳述也是透過一名記者溫克爾(Winker)的四處收集才得以呈現。但溫克爾做這些事，並不像阿堇尼斯卡僅是為了好奇。他是不得不收了黨宣傳部的錢，準備做一個打擊湯柴克個人的反宣傳，以降低但澤罷工委員會的影響力，並分化其內部意見（華勒沙個人也曾被波蘭的新聞媒體這樣有計劃，不實在的污蔑過。）溫克爾是個中年的新聞工作者，在一九七〇年曾報導過巴庫的故事，後來因此被整肅入獄。由於特務勢力的介入，他提早獲釋，回到電視台工作，所做的無非是「表演性的，宣揚國策，歌頌黨的新聞」（華達早年剛出道時，也拍過這種宣傳片，為此他曾非常慚愧。）本來，他想拒絕這個任務，無奈太多把柄在人手，開不了口。從華沙到了但澤船廠，無意間，碰到以前的同事，此人剛好是湯柴克大學的同學，在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事件」時，曾隨湯柴克跑去請求巴庫，要求工人組織支持學生運動。當時巴庫是工會活動份子，以他一生鬪爭的經驗，他認為時間不對，沒有成功的希望，加入示威只是暴露組織，徒然增加犧牲而已，因此拒絕支援學生。從此，父子裂隙，難以彌補。直

到一九七〇年，工人起來時，學生團體報復性的採取觀望態度。儘管街上的工人一直呼籲，要求學生走到街上來一同遊行，學生却痛苦的躲在室內處理內心的矛盾。不久，巴庫在街上中彈死亡的消息傳來，湯柴克再也壓抑不住，衝到街上，想把屍體找回來，但是屍體已被運走。事後，在陳屍間認屍，才領到屍體草草的安葬。這時吉力克上台，在電視上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保證改進一切（其實，吉力克在二年前的學生運動中，是極力主張鎮壓手段的。）湯柴克當衆斥之為謊言，衝動的要打毀電視機，幸得好心的同學攔阻，送入精神病院，免得落到秘密警察手中。湯柴克出院後，毅然的放棄學業，決定進工廠。似乎，他認為父親的死是他的責任，而顯然的，他父親，也是他未完的工作，只有在工廠，在工人之間才可能完成。

接著，溫克爾拜訪湯柴克的鄰居，一位老婦人，和巴庫是熟悉的，她在七〇年的事件中見到巴庫從容的走進槍林彈雨中而倒下來。她幫忙埋葬巴庫。在湯柴克出院後，陪他到墓地，却發現巴庫的墓也失蹤了，原來當政者連個死人也容忍不下，硬是要把他從地球上抹掉。老婦人從此才認識到這個政權的邪惡性，「一個已死的人，他們都要作弄！」湯柴克進工廠之後的事蹟到八〇年的罷工是由他妻子陳述的。他妻子就是阿堇尼斯卡，爲了拍一部有關巴庫一生的片子，他們認識了。拍片計劃到後來完全被取消，攝影機、攝影師、底片都扣住了。阿堇尼斯卡仍堅持要用幻燈片拍，結果她的工作也泡湯了。他們決定用所拍的幻燈片來個照片展，此事爲湯柴克在工廠的黨委知悉，便親自到他家來警告。在這種四面楚歌的絕望中，阿堇尼斯卡依賴湯柴克的支持，才沒有垮下來。她知道這個恩愛遲早會為自己帶來悲劇，但是湯柴克樂觀的信心，鋼鐵般的意志，却使她再也不能自己。他們的婚禮在天主堂舉行，華勒沙是他們的見證人。七六年，拉東及烏沙的罷工，湯柴克極力說服但澤的工人加入行動，從多年來的經驗，工人不只要聯合工人，也要聯合其他階層的各種勢力，才可能贏得勝利，而團結合作，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可惜，工人的視野也常爲自身的利益所限，看不到那麼大。七六年之後，湯柴克更積極的從事軍人教育工作，他到處散發傳單、小冊子，却以隨便亂垃圾的罪名入獄。此時，阿

堇尼斯卡已懷孕，生活困苦，但工人代表送來的金錢，她却不願接受。她說：「我不接受施捨。」工人代表很爲難的說：「請不要將這個看成施捨，這只是表示我們團結的意思。」在這個情況下，這筆金錢就不能不收了。湯柴克出獄後，仍然經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爲了孩子的緣故，阿堇尼斯卡帶著孩子回到娘家。不久但澤船廠就罷工，這次的罷工起因也是反對物價上漲，但是整個行動的組織性、策略性，都是空前的成熟，這種成熟是一九五六年以來，各個階層的反對勢力，經過多次挫折、失敗，在絕望中學習得來的。溫克爾在與這些人對談之後，除了感動、慚愧之外，實在無能爲力再爲秘密警察服務了。固然電影是以團結工聯的勝利爲尾聲，華達並沒有被這項勝利沖昏了頭，片子結尾，溫克爾隨著歡呼的人群走出來，碰到當地督導他工作的特務頭頭，他向溫克爾說：「這些條文都沒有效的，你看著好了。」

果然，「團結工聯」只活了十六個月，大多數工聯領袖已身陷囹圄，或者轉入日夜被追捕的地下活動中。除非，奇蹟出現，波蘭工人這三十年來奮鬥的一點小成果，——團結工聯——將從此成爲歷史名詞。但是，從華達的眼中來看，巴庫這一代垮了，湯柴克這一代又會出來。如果巴庫代表的是心性純簡、堅硬的第一代工人，那麼他們的缺點，例如缺乏謀略，組織，知識，將被第二代的工人所彌補，而這個代表便是湯柴克了，在心性上，他們不只堅硬，在策略上也有更大的彈性，他們受過教育，也自我教育，他們看得到，統治階級的敗德邪惡，也看得到新波蘭的美景，他們不像巴庫那麼孤獨，他們有同志，有組織。如果這一代必須在監獄過完他們的黃金歲月，第三代仍然會站出來的。從教皇在波蘭的新聞片，可以看到少年男女帶著吉他、帳篷、背著背包，成群結隊，唱著歌，追隨教皇從南走到北，那種天真虔誠的精神，可能就是新波蘭的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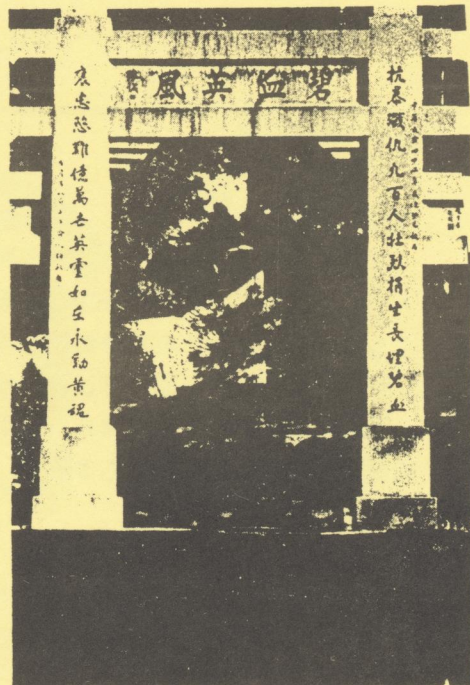
「參考資料」

Jakub Karpinsky, "Countdown: The Polish Upeavals of 1956, 1968, 1970, 1976, 1980..."
Translated by O. Amsterdamska and G. M. Moore;
New York: Karz-Cohl Inc.



起義前的霧社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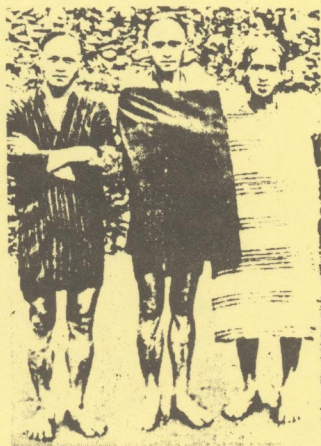
霧社起義事件



請參閱本期專文
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

光復後由國府當局所建的抗日霧社起義紀念碑和領導人物摩那·羅達奧的墓（1974年春天竣工）。

下：起義高山族最後以自殺來抗議日本的暴政。



上右：起義的核心人物（中為摩那·羅達奧，右為「馬黑波」社領導人物之一，左為「布加薩」社的首長。

左：木乃伊化的摩那·羅達奧，直到1973年尚被當作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標本，後受到輿論指摘才葬於霧社。



支援會代售書目錄

【美麗島合訂本】——

高雄事件調查辯論，已告一段落關心台灣民主的人士，對國民黨當局選擇民主亦或獨裁，正拭目以待。此合訂本登錄八名被告對民主與台灣前途的宏言說論。關心台灣的朋友可以從這本珍貴的文獻中，了解到他們是否有國民黨起訴書中指稱的暴力、顛覆、台獨、叛國思想。（\$5.50）

【黨外文選】——

收集活躍於高雄大整肅前的民主人士憂國憂時的文章，「黨外人士」的面目，真相如何，讀者可從中獲得端倪。（\$4.00）

【大軍壓境】——

張俊宏先生向其妻說「我們家沒錢，不要請律師了，沒用的」。在此書中，你可以了解在大軍壓境下，孤臣無力挽回天的無奈心情。（\$4.00）

【從蘭陽到霧峯】——

林義雄先生，在民意的驅策下，從蘭陽到霧峯，却在廿世紀最醜惡的政治冤獄下，從霧峯即將出發到火燒島。這本林先生的心路歷程，您不妨放置床頭，隨時瀏覽。（\$5.50）

【永不退却】——

黃順興先生，堪幸在高雄大整肅中漏網，但他的未來政治生涯，仍重重包圍於極權陰影之下。卅年的鬭爭經驗，使他了解人權與民主只有強硬力爭

而來。美麗島審判以後，益形孤單的他，是否仍堅持「永不退却」呢？本書是先言之語，也是未來答案。（\$5.50）

【到民主之路】——

高雄事件之後，在困難的局面下，黨外人士如何再出發？三年前黃煌雄的這本書，記錄了在低氣壓下，黨外人士堅持民主之路的意義與內含。（\$3.00）

【歷史的證言】——

永不退却的民主運動老兵，在這本書忠實地反映了大眾的心聲，這不只是民主的證言，而且是社會的證言。你想了解台灣的經濟問題、農業問題、公害問題，本書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10.00）

【高雄事件專輯】——

高雄事件已過了三年多，但它的影響却仍可在台灣社會各角落感覺到，也在多少關心台灣前途者的內心盪漾。本書忠實地錄下這一事件的第一手資料。（\$15.00）

以上書款請附加10%的郵費及包裝費。請將支票連同購書信寄達：

OSDM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OSDM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To: